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Irregular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269期

徐明曜专辑

目 录

【专稿】

我的大学（一）

——大学前一年半

我的大学（二）

——政治宽松的两年

我的大学（三）

——最后两年的检查与批判

写在《我的大学》完稿之后

【资料】

1. 系统交代材料（1969年5月1日）
2. 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提纲）
3. 补充交代几个问题（一）
4. 补充交代几个问题（二）（1969年5月10日）
5. 唐山五中革命委员会
《徐明曜综合材料》（1969年6月9-22日）
6. 唐山齿轮厂革命委员会对徐明曜问题的处理意见
7. 对五中处理意见的一点说明（1969年7月1日）
8. 1979年申请平反（1979年9月25日）
9. 对“申诉书”的几点说明
10. 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大学委员会（1980年6月1日）
《对徐明跃1965年受开除团籍处分的改正决定》

【本刊声明】



作者简介：

徐明曜，1941年9月生于天津市，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父母定居北平。小、中、大学都是在北京上的。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力系数学专业，随即被分配到河北省唐山市五中工作，在唐山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全过程。1978年考入北大数学系读研究生，1980年提前毕业留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988年提升为教授，后又提升为博士生导师。共培养博士生13名，硕士生多名。2004年在北大退休。2003-2009年受聘为山西师大特聘教授，协助指导研究生。2010年起，自学中国近现代史，数篇习作发表在网刊《记忆》上。主要研究兴趣：1957--1976年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

【专稿】

我的大学（一）

——大学前一年半

我是1959年考入北大的，读的是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入学时说是五年制，但1960年学校规定所有理科系均改为六年制。到了1964年，根据毛泽东学制要缩短的指示，又要改回五年制，但为时已晚，教学计划是按照六年安排的，实在难于再缩短一年，所以只缩短了半年，改为五年半制，而1960年入学的则改为五年制。这样，我的毕业时间应该是1965年1月。但实际的离校时间是1965年4月，比低我们一年的1960级仅早走三个月。

我在大学读书的近六年时间，恰在反右（1957—58年）和文革（1966—76年）这两个毛泽东时代最大的政治运动之间，这段时间读大学是不是风平浪静，可以专心读书、很少政治运动呢？从我的大学六年的经历看，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也经历了不少难以忘怀的政治运动，经历了惨烈的批判与斗争。同学们对于当时的错误做法也有痛苦的思想斗争，也有公开和不公开的抗争。只是因为反右和文革过于惨烈，人们对于这两大运动之间的那段历史关注得少些。即使关注，也多关注全国性的“四清”运动，对发生在大学里面的事很少有人关注。更何况各个大学的情况差别很大，即使同在北京，即使近如北大与清华，政治气候也有很大不同。正因为此，我把我在北大的经历

写出来，就有它的必要，总算记录了一段历史吧。

我将按照时间顺序叙述我在大学各个阶段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希望把一个真实的自己展现在大家面前。为此，首先简要介绍一下上大学前的我。

一、上大学以前

上大学前，从政治思想上说，大部分时间里（1957年反右以前）我是自觉的左派，相信党，决心为共产主义而奋斗。1957年反右后开始对党的方针政策有所思索，可以认为是痛苦思想斗争的开端。

我为什么相信党，是因为在国民党时代的生活经验告诉我，或者使我相信，国民党专制独裁，共产党讲民主自由；国民党贪污腐败，共产党清正廉洁。记得在1948年底，大概傅作义还没有和共产党谈妥北平的和平解放，北平已经有国民党兵勒索抢劫的事。一天晚上，几个国民党兵敲砸我家的大门，父亲见势不好，用一根粗木杠顶住大门，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要借东西修工事，父亲说修工事要工具就够了，于是把锹、镐等物从院墙扔到外面，就是不开门。僵持了一会儿，他们悻悻地走了。注意这事是发生在北平内城，有什么工事可修呢？这件事使我对国民党产生恶感。再加上我的小学班主任（后来知道）是共产党地下党员，我作为听话的好学生，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他的影响。因此，解放前我的思想已经十分倾向于共产党。

北平和平解放那天，我打着小红旗去欢迎解放军，看到他们个个洋溢着青春的风采，唱着革命歌曲，我真盼望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让我们回忆一下当时常唱的《团结就是力量》的歌词：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
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中也有“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的词句。可以说，这些革命歌曲都在歌颂民主，反对独裁。

再有，我们从小学到初中所受的教育，都是把民主、自由、平等作为正面的政治理想来倡导的。我们作为不谙世事的孩子，还不可能全面地评估一个党派的政治作为与政策取向，再加上对共产主义社会诱人前景的铺天盖地的宣传，这就使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发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自觉地按党指引的方向努力，甚至标榜自己是个共产主义者。我那时的激进态度还曾深深地伤害了我的父亲，这使我至今仍感到内疚。为了说清这件事，还要先介绍一下我的父亲。

我父亲解放前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职员，解放后留用在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编辑《金融通报》。三反运动时，被当作贪污犯揪出，由于态度不好，被正式逮捕。可他仍然坚持自己没有贪污，声称如果查出他有一分钱贪污，就枪毙他。经过一年多的审查，也确实没有查出他有贪污，但总要找罪名。就说他是泄露了国家经济情报，什么情报呢？写的是“黄金黑市”。这是指解放后，黄金禁止公开交易，只准卖给国家，但有些资本家还在做黄金的黑市交易。我父亲给我看了他的判决书，并说“黄金黑市的价格怎么是国家经济情报呢？”表示对判决不服。（他其实没被判刑，仅判‘机关管制二年’，降职降薪，调到绥远省（现内蒙）工作，两年后因病辞职回京。）开始我对他表示同情，但他总因为这件事发牢骚，说“共产党政治上厉害”，他被冤枉了等等，我就不耐烦了。我当时认为，即使是被冤枉了，也不应总发牢骚，“三反运动”是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怎能一点偏差不出？于是在一次他又发牢骚时，我指着他说：“你这就是‘没落阶级的哀鸣’！”这句话给他的伤害太大了，事后我也觉得有些过分，总想向他承认错误。但直到他于1991年去世，我也没有找到机会向他承认，让他带着感情上的伤痛离开了人世。今天我说这些，就算是对他的忏悔吧。

由于我有这样的思想基础，自然积极要求入团，14岁入团后一直做团干部，上高中后，做了一年多北京四中的团委会常委和学习部部长。

那时我崇拜共产党员，认为他们都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他们活着是为了让别人活得更好、更幸福，我也发誓要做这样的人。

我对党的信仰的第一次动摇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我看到我很崇敬的四中物理老师王钊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他对党的工作提了一些意见，内心很不理解。如果单为王老师被打成右派这件事，也许我还会认为，这是运动中不可避免的偏差。但更

让我不能理解的是，在读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反右的指导性文件）时，看到有“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的提法（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368页第2—5行），这使我大为不解。在我当时幼稚的政治理想里，民主是我们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共产党就是靠实行民主才能战胜国民党政权的。怎么突然变成了实行某种目标的手段。那么，是不是说，达到了所追求的目标——取得了政权以后，就可以不要民主了呢？这使我陷入了长达数日的思索。我拿着这本小册子，在四中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走着，总解不开心中的问题。后来，到了1958年5月，我病了，不得不休学，但我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从这时起，我开始有目的地看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看卢梭、狄德罗和法国百科全书派的著作，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始终不得其解。

1958年暑假，北京四中团委搞了整团运动，我因病没有参加。整团后听说有的同学无端挨整，我内心很不以为然。心想，经济建设搞得好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胜利完成，又号召向科学进军，怎么又搞起整人的事？明明毛主席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那为什么不好好搞建设？于是对党的疑问越来越多。再加上我休学后在丰盛街道团委协助工作，亲历“打麻雀”、“街道炼钢”等荒唐事，对党的一些做法的正确性的怀疑已经十分严重。此时又正在“大跃进”的高潮时期，社会上说假话的风气盛行，粮食高产卫星天天放，居然有亩产数万斤的“卫星”放出来。记得有一次我和街道上的朋友提及此事，他说，报上登的农民科学家王××还论证可以达到亩产100万斤哪！^①于是我对大跃进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样，我从小形成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这都是在党的教育之下形成的）与社会的实际情况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再加上神经衰弱的折磨使我感到的无法摆脱的痛苦情绪促使我决定不再复学，于1959年5月去北京四中办了退学手续。

退学后，我以同等学力资格考了一次大学，想考不上就参加工作。（那时工作很好找，我的好几个初中同学在中科院的一些研究所担任实验员，我也想和他们到一起。）我补习了高三的功课，参加了高考。结果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力系，于是我的生活就又改变了方向。

^① 在修改本文时，我查了一些文献，那个农民科学家叫王保京，他在1958年9月27日《陕西日报》上发表“有高密度密植，才有高额丰产”一文，论证用他发明的所谓“楼种法”每亩地每年即可收粮240万斤（不是100万斤）。为此，他13次被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并当上了咸阳市副市长，作地市级领导22年。又，《人民日报》1958年8月27日曾发表题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1996年8月8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著文指王保京对这个口号有发明权，被王保京告上法庭。

二、初识政治运动

上大学前，尽管已经有了反右运动，我对大学还多少抱有一点“世外桃源”的幻



想，以为总会比中学自由些。上北大的第一个月风平浪静，学习也不费劲，又有名师讲课，闵嗣鹤教数学分析，程庆民教解析几何。我注意休息，身体也有好转。记得开学上课的第一天（是上的劳动课）正好是我的十八岁生日（1959年9月7日），颇有纪念意义，感到自己成人了，曾暗暗发誓要好好学习，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

但一个多月后，就让我见识了什么是政治运动，这就是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学习。我当时实在是太幼稚，（北大研究生，1979年摄）以为只是学习学习，端正一下思想。哪里知道这是在中央全会批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党内又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以后，在群众中抓小彭德怀呢。在学完文件，联系个人思想的阶段，当党团干部动员我发言时，我毫无顾忌地讲了在街道炼钢的荒唐，说“砸了不少锅，一两钢也没炼出来。”当时还没有什么，哪知很快，大约在十一月中旬，党团组织就对怀疑三面红旗的言论进行了批判，而且我被选为重点批判的对象。这使我第一次见识到了政治批判的厉害。虽然对一般同学暴露出来的错误思想的批判还算温和，但对每个班选出的一至二名重点对象进行批判时，真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层层加码、无限上纲，最终都往“反党”上拉。我不知道事前是不是有布置，单就我个人的感受是批判会组织得有条不紊，批判者有论点，有逻辑，虽然都是一些歪理，但火药味足，震慑力大。这使被批判者感到自己真是犯了弥天大罪，必须认罪，并努力改造。心里想不通也只能免开尊口。

那时常用的批判逻辑有：1. 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党是群众运动的领导，而你反对群众运动（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就是反党。2. 对党的领导不能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你说三面红旗是好的，但又说你们那里执行得有偏差就不行；你说人民公社是好的，但又说你们村的农村干部有缺点也不行。3. 主客观的一致性。你说你主观上是拥护三面红旗的，但客观上你的言论是反对三面红旗的，那就说明你主观上也是反对三面红旗的。4. 怀疑就是反对。对党的方针政策怎能怀疑呢？你怀疑不就是认为它可能错吗，那不就是内心里反对吗？这样，连思考一下都不允许了，只能盲从。5. 阶

级立场不对。广大人民群众正在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精神为三面红旗而奋斗，而你却还在思考三面红旗对不对，你不是站在反对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吗，反对人民群众的立场不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吗？诸如此类的歪理甚多，几个回合下来，被批判者只能承认自己是从主观上反对三面红旗、反党的，于是承认自己有罪。我也是在这样的逻辑下承认自己有罪的。

光承认有罪还不够，还要深挖思想根源。拿我来说，在休学时曾看过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狄德罗等人的书，觉得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是好的，那就和党内那个右倾机会主义头子（指彭德怀，他曾在1943年提倡平等、自由、博爱）一样，只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这样，我的立场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了。因此，就变成了党的敌人。批判深入到这种程度，我就被彻底孤立了。那时，同学们不敢理我，我也不愿意过早回到宿舍。每当我不得不回宿舍睡觉时，本来谈笑自若的室友突然都不讲话了，这又给我很大的压力，更觉得自己问题的严重。就是一句“我家所在的街道一两钢也没炼出来”，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我那时只有18岁，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阵势，心里真的很害怕。我终于理解了我父亲所说的“共产党政治上厉害”的含义。

这段时间我的思想斗争也是很激烈的。我向党交心时只说了“我家所在的街道一两钢也没炼出来”这句话，但内心里没说出的话还有很多，一挨批就吓回去不说了。比如，在打麻雀运动时，我曾感到很荒唐可笑；报纸上经常宣传的放高产卫星我也有怀疑等等。另外，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时，农村来的同学的发言又使我知道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事，比如农村干部多吃多占、打人骂人的事，农村已经出现粮食不够百姓挨饿的事，农民群众对大办集体食堂的不满等。

运动以把暴露思想的被批判者批倒斗臭而群众受到教育（即不敢再说与党的方针政策不同的话）为结束。接着就要鼓足干劲投入到大跃进运动中去了。至于对我这样的被批判者，则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勉励我们要在今后的革命运动中接受考验，悔过自新。

大学的第一个学期结束了。年级领导宣布不放寒假，要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里继续革命。

三、“编红书”运动和教育革命

寒假里，年级党团组织利用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学习产生的政治热情，在全年级开展了“编红书”的革命运动。所谓“编红书”，就是要学生自己编写上课用的新教材，不管是学过的部分还是没有学过的部分。旧的教材都不能用了，因为是封资修的。那时的指导思想是，要砸烂资产阶级的旧世界，建立无产阶级的新世界。“旧教材”也属于要被砸烂的东西，不能再使用了；而新教材必须是无产阶级的。为什么要由没有学过的学生去编呢？因为没学过，就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才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坦白地说，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的文件时受的批判，并没有引起我太激烈的思想斗争，只是从没见过批判会的架势，内心极为害怕而已。可对于“编红书”，我内心有太多的不理解。比如编数学分析教材，说用“ $\epsilon - \delta$ ”方法描述极限是资产阶级的故弄玄虚，我就很不赞成。在第一学期学习“ $\epsilon - \delta$ ”方法时，我为终于找到了一种严格的描述极限的方法而兴奋不已，认为这是用有限步骤描述无限过程的天才创造，丝毫也没有感到难学。怎么现在又要批判呢？说句题外话，这种对“ $\epsilon - \delta$ ”方法的曲解在文革时就发展成为“一把大锉锉出微积分”的荒谬说法。又比如，要我编没有学过的曲线积分和曲面积分，我说了句“还没学过怎么编？”负责编书的老师马上说：“破除迷信嘛！”登时吓得我不敢再说下去。我只好看了看辛钦的《数学分析简明教程》的有关部分，写了写，负责老师居然说我写得好，特别是编的例题更好，说得我内心好惭愧，觉得简直就像开玩笑，内心感到戚戚然。又比如，在为编书造声势时，师生贴了不少大字报，提出“砸烂牛家店”、“火烧哥家楼”的口号。^①

又有人提出“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数学”的口号，我看到后内心一震，这与我休学时读过的，列宁极力反对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张何其相似。^②可我当时不敢说，直到1962年政治比较宽松时我才和同学们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编书运动反映了

^① “牛家店”指牛顿，微积分的创始者之一，“哥家楼”指哥西，19世纪数学批判运动的领导者，对微积分的严格化做出重要的贡献；口号则模仿五四运动时的“砸烂孔家店”、“火烧赵家楼”。

^② 无产阶级文化派是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为基本组织的苏联早期文化派别。它于1917年10月在彼得格勒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宣布成立。卢那察尔斯基任协会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卡里宁任中央委员会执行局主席。1918年以后，列别杰夫·波梁斯基和普列特涅夫先后接任协会主席职务。“无产阶级文化派”对旧文化持全盘否定态度，主张将其全部抛弃，要抛开广大工农和知识分子，要远离社会实践，要把无产阶级关在实验室里，创造一种特殊的纯粹又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在《共青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这篇演说和他所起草的《论无产阶级文化》决议草案（1920年10月8日）等文章中批判了这种极“左”的小资产阶级错误观点，指出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他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所臆想出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要由人民群众来创造，因此，必须大大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同时还要团结改造资产阶级专家和知识分子，才能创造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一种极其错误的思想倾向，即在哲学上用唯意志论代替唯物主义；政治上过度强调阶级斗争，不承认存在无阶级性的事物；以及文化上的虚无主义，只讲创新，不讲继承。

紧接着，一年级下学期开学又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运动，整整搞了近一年。宗旨是用总路线精神指导教学，来个学习大跃进。于是把课表完全打乱，好在有编书时形成的“一切时间党安排”的传统，每天上三段课，即上午、下午和晚上，大约十节课。如果上数学分析，就全天都上数学分析；上高等代数，就全天都上高等代数。课堂上老师讲得疲惫不堪，学生在下面打瞌睡。十天半月过去，宣布这门课学完了，还要开总结会向党报喜，真是大跃进！另一方面，教学要联系实际。比如高等代数，不按课本顺序讲（其实那时也没有课本），要以“图上作业法”和“表上作业法”来“带”，据说矩阵、向量空间、线性变换等概念都是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结果呢，什么也没学会，这阵风刮过去，到了高年级还要补一年级的基础课。比我们高一年的1958级同学甚至在四年级（还是五年级）还要上一年级的数学分析，成为数学教学史上的笑话。

另外，那时浮夸风也很严重。上了课总得考试吧，没学会怎么办？只有作弊。那么怎么作弊呢？我仅以俄语大跃进的考试来做个例子。由于师生都心知肚明，老师干脆考学生当场阅读《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的俄语版。规定考一段时间（比如半小时），老师喊：“开始！”同学们则煞有介事地翻开书看，只听得肃静中一片翻书声。突然老师喊：“停！”同学们标出他看到哪里。然后依次请同学讲他看的这一段的内容。由于政治学习时已经把这三篇文章熟记在心，当然每个同学都能讲出来。最后是统计你读了多少印刷符号，读得多的分数高。据说我们班一位同学半小时读了几十万印刷符号，是列宁阅读速度的五倍！

四、一切时间党安排

前面提到的“一切时间党安排”，是一年级第一学期末到二年级第一学期末那一年大学生活的突出特点。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指引下，那时没有周末，没有假日，没有个人自由活动时间，完全统一行动。就是说，“一切时间”不是指一切课内时间，而是指所有时间，即每天的24小时，每周的七天，每年的365天。

具体地说，每天统一时间起床，洗漱后做操，统一时间去早餐，统一时间到教室上上午的课。中午买来饭后，要回到宿舍边吃边开会，布置本日大跃进的安排，然后有短暂时间休息或写大字报、小型誓师或批判会等，然后一起去上下午的课。晚饭时

与午饭大体相同，然后是上晚上的大约三小时课。课后大家都已经十分疲倦，不少人上课时就打瞌睡，但回宿舍后还有很多安排。一般是写大字报，向党表决心，有时开批判会，有时搞卫生，有时搞文娱活动，合唱革命歌曲等，但这一切都是作为政治运动来搞的，自然就没有不参加的可能。当然也有复习功课的事，但也要集体行动。特别是学习较差的工农同学，要和学习较好的同学结成对子，“一帮一，一对红”。晚上也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我记得有一天，我班级团支书突然宣布，在未名湖发现敌情，其时正下大雨，同学们分几路跑到未名湖寻找，终于发现在湖中岛上隐藏的几个同学，于是告诉大家这是军事演习。类似这样的突发的安排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这些活动搞完了，常常已经是半夜两三点，于是领导宣布休整几小时，到这时同学们才可以上床去睡觉。多数同学已经十分疲惫，倒床上就睡着了。但也有些同学因白天过于兴奋，犯了神经衰弱，反而睡不着了。我记得有几位同学就是因为不适应这种紧张的生活而不得不休学的。第二天周而复始，还是一样的安排。终于盼到了星期天，以为会休息了（那时每周工作六天，星期六不放假），结果领导说要发扬不断革命、不怕疲劳的精神，要继续跃进，仍然不休息。星期日班上通常安排需要较长时间的活动。比如去校外参观，突击搞卫生，开大批判会，或参加劳动等。我记得我曾和几个同学到我家所在的丰盛街道合作搞超声波，砸扁了铁管夹个刀片，用蒸汽吹，刀片震动即产生超声波，可用于做饭，蒸馒头等等，其实都是假的。有时周日也有几小时休整时间，可洗澡、洗衣、拆洗被褥。为发扬勤俭节约的精神，记得男同学理发都是同学互理，买个推子，不管会不会理，反正拿同学当试验品，理几回也就学会了。由于集体活动这样紧张，北京的同学想回家就很困难了。在这一年中，我记得只有很少几次能抽出时间回家的，而且常常是周六晚上回去，周日早晨赶回来的。因为北京同学不多，这个问题并不突出，北京同学有意见也不敢说。有人会说，过年过节该放假了吧，其实不然。在那革命的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放假简直是罪过。根据我的记忆，1960年的春节只给北京同学放了一天假，回家看了看。外地同学却没有这样的福分，还要在校坚持闹革命。这样的紧张状态持续了一年有余，一直到1960年底公布“劳逸结合”才告结束。

我曾和几个年轻人说过这事，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的还说，又没到愚人节，你瞎说什么呀？可这确实确实是真事，就发生在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时间从1959年底到1960年底的真事。

五、批判马寅初校长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一年级第一学期末，大概在1959年底开始了全校师生批判校长马寅初的运动。我当时正在挨批判，对这场运动关心得不够。只听说是批判他的“新人口论”和“团团转”理论。我看了不少大字报，惭愧的是至今我也没有弄清什么是“团团转”理论。我还有印象的是，一位党委干部批判他说：“马寅初姓的马不是马克思的马，而是马尔萨斯的马。”我当时觉得这种玩笑话只能在下面说说，怎能放在严肃的批判会上呢？还有一位据说了解内情的干部批判他说，马寅初在某地吃饭，喝了鸡汤不给钱，还狡辩说，“我只喝汤，又没吃肉，给什么钱”，引起与会者哄堂大笑。我听了以后，实在笑不起来，这种人身攻击反使我同情马寅初了。再有就是贴满校园的大字报，也让全体同学写大字报批判马校长，这些就是我对这次批判的片段记忆。

谈到喝鸡汤事，记得在1960年的暑假，青海财经学院院长，经济学家宁嘉风教授到我家看望我的父亲，他问起北大批判马寅初的事，我说了喝鸡汤不给钱那件事。他思索了片刻，叹口气说：“要想把一个人搞臭，编造生活上的劣迹是最简单的办法。”这使我认识到对马寅初批判的不择手段。

另外，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马寅初的态度十分倔强，他在一次批判会上郑重宣布：“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据说，马寅初还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尊严不能不维护。”这些话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年知识分子的风骨。

批判马寅初后，大约在1960年4月初，校方宣布马寅初“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由党委书记陆平兼任校长。从此开启了北大历史上的极左时代。也怪了，文革时又说陆平是“右”了，政治的诡谲有谁能懂得呢！

六、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一年级第二学期的另一件大事是所谓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在前面“一切时间党安排”那节中已经略有提及。这个运动的时间是在1960年的上半年，其时中国大地上的大跃进运动已经到了尾声，但北大校园里仍处于狂热的气氛当中。这个运动的背景是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回应赫鲁晓夫的“苏联要15年赶超美国”说

法时谈到要让中国在15年内赶超英国，而在1958年6月大跃进高潮时毛泽东又说：“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73-274页。）这就需要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上做文章。而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现鞍山市搞得很好，并批转了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于是形成了全国性的技术革新运动的一个高潮。

在这个运动中，我们班级先在校内，后又下厂、下街道搞了近半年的运动。印象较深的是我们班级试验超声波和半导体的事。前面已经提到，我曾经主动要求带领十几个同学到我以前休学时所在的北京丰盛街道，帮助他们搞“超声波”，这其实是为了表示自己积极参加运动。我们把铁管砸扁，再插上刀片，管内通过蒸汽，刀片震动，就认为是“超声波”试验成功了。听说可以用超声波来蒸馒头，我们就把几个这种所谓的“超声波发生器”安装在蒸锅里，另一个锅烧开水，蒸汽通过超声波发生器到蒸馒头的锅里，看多少时间能把馒头蒸熟。结果发现并没有节省时间，效果并不好。但毕竟馒头蒸熟了，就宣布超声波试验成功，于是敲锣打鼓向党报喜。其他班也有到二龙路街道搞的，效果也不是很好。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超声波的原理，也不知道超声波是否真能用来蒸馒头，并节省燃料。

还记得有一次，让我们班几个同学（包括我）到固体力学实验室去研究用超声波切割塑料。那种塑料是做固体应力实验用的，价格昂贵。我们还用老办法，铁管夹刀片再用蒸汽吹，结果塑料受热变软，很容易就切成小块了。然后又是敲锣打鼓向党报喜。事后我们被告知，那些塑料都报废了，造成很大的损失。

再说半导体试验，那时的口号是“破除迷信”，不相信权威。我们就寻找各种材料往小玻璃管里放，用万用表测量两边的电阻，当发现两边电阻略有不同时，就“宣布”半导体试验成功，又是敲锣打鼓向党报喜。今天看来，这种活动几近儿戏。

在那半年的运动中，被认为真正有了成绩并登了报的是北大生物系人工合成胰岛素获得成功，但我是外行，不知内情真正如何。

七、疯狂的革命年代

大学的前一年半，除了第一学期前期上课基本正常之外，都被疯狂的“革命活动”所充满。除了前面提到的“编红书”、“学习大跃进”、“批判马寅初”、“技术革

新和技术革命”等，还有大大小小很多次的革命活动。这些活动都是班级或年级负责人布置实行的，因此，应当都是来自上边，不会是班级干部独出心裁的。

具体有哪些运动呢？我凭记忆举出以下几点。

1. 卫生大跃进：即突击搞宿舍卫生，做到无卫生死角。检查时专门找容易藏污纳垢的角落，如用手摸有灰尘必须重新来一遍。而且被子都叠成部队营房中的豆腐块，要有棱有角。被子有点脏的自然要清洗干净，不会缝被子的要找女同学帮忙，而女同学也都愿意帮忙。书籍杂物要放置整齐，不可随意乱丢。搞完卫生后，要通过各级检查，首先是本宿舍内互查，然后小组、班级、年级检查，甚至全校抽查。结果要全校通报。甚至在1960年4月8日，还开了全校的“卫生工作持续跃进大会”，可见领导之重视。

2. 红专问题大辩论^①：从一年级末就开始了。总的提法是要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讨论什么是又红又专。自然要有反面典型，记得那时批了教师马希文，学生中各班也都有典型。对于这个问题，我在读中学时就有所触及。那时我在北京四中，在讨论什么是又红又专时，我说：“红就是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专是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本领”，结果遭到了批评。学校某党委副书记批评我说，现在提又红又专就是要讲红，不要提专，说我缺乏组织观念云云。这次大学时的红专辩论我干脆主动承认自己有白专思想，把努力学习硬说成是白专，来争取过关。结果不但没过去，反而成了白专典型。

也是在这次运动中，党团组织明确地说，对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党采取的是赎买政策，因为他们都是在中共建政前受的教育，他们上学是自己花钱的，解放后只是用他们的知识为党服务，并没有把他们当成自己人。这曾经让我大吃一惊，觉得和周恩来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十分不同。后来我发现，周的报告早已被收回，真是觉得自己的思想太跟不上形势。

3. 向党交心运动：读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首先学到的是要把心交给党。即是要找组织谈思想，特别是谈自己不符合党要求的错误思想。与此同时，也要谈别人的错误思想。对于后者，旧道德认为这是告密行为，是君子所不齿的。而现在要转变过来，认为它是应该的，甚至是光荣的，否则就是不信任党，对党不忠诚。

^① 社会上的“红专辩论”是紧接着反右在高校中进行的。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关于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这是红专辩论的指导思想。而且，在1958年中还在高校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使得没有划为右派的老专家又挨了一次整。

我们班级的向党交心运动是从1959年11月开始的。那时人人都要写思想汇报，揭露自己，揭发别人。我当然也写，而且写得很多。但我没有写过揭发别人的材料。这一方面是因为我所受的家庭教育告诉我揭发别人等同于告密行为，从道德自我完善的角度不愿意写；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当时的处境，写了恐怕组织上也不会信，反而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但1963年以后，组织上勒令我写检查，一共写了一年半，直到毕业。这段时间，我写了多份检查，总长度达数百页。除主要检查自己外，应该也有对别人的揭发。但因写的都与自己的问题有关，而且属组织上早就知道的，故也不存在告密邀功的情况。可是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在1963年底写的系统交代材料《对过去的清算》，其中谈到一位同学曾和我说过的反动话（此话在后面还有叙述，就不在这里写出了），用以表明自己对这样的反动话还是有鉴别能力的。这个同学因为“偷越国境”被逮捕判刑，不知我的交代是否使他多吃了苦头。虽然现在该同学早被释放平反，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我想起在我的检查中说的话，内心总有愧疚之感，特别是在文革以后。我感到自己对此应该忏悔，这是我道德上的一个污点。

想到以前读过的几位法国学者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目前还没有中译本，但有英译本：*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在该书的前言里面有这样的话：“在崇高理想的名义下做坏事比直接做坏事更邪恶。”我们那时的告密行为都是在崇高理想的名义下做的，今天我们更应该为此忏悔。

另外，在向党交心运动中，“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口号也成了同学们的座右铭和努力方向。刚听到这个口号时我有非常大的抵触情绪，觉得这和“独立思考”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我总认为“独立思考”精神是党对我们的教育，记得在中学时提倡所谓“娜斯佳精神”，娜斯佳是前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女主角，她保持独立思考的精神，对官僚主义等错误勇于斗争，不怕打击报复，是小说中的正面典型。可我并没有想到，在反右派斗争中，“独立思考”精神早就成了反党的代名词。我还抱着它不放，自然造成后来的人生悲剧。这点容下面再详谈。

4. 教室里的暴力：一年级上学期的解析几何课本是由曾为右派分子的程庆民老师上，当时已经摘帽。但据说他看不起工农同学，在发考卷时按分数高低发，工农同学都在后面，遂引起他们的不满。于是在年级级主任周××的操纵下，竟开了全年级同学对他的批判大会。批判时，几位同学竟闯到讲台上，高喊口号，甚至还有一位同学从教室的后排跑到台上，使劲摁程老师的头，大喊：“低头！向工农同学认罪！”

大有文革时批斗的架势。这种暴力行为不仅没有得到官方的制止，反而在批判会后，由年级主任宣布取消程老师的上课资格，进行劳动改造。他的课由当时的年轻教师姜伯驹代上。

其实程在1949年前就为地下党做了不少工作，1949年后一直做系团委书记和党总支委员，只是在反右时对给学生划右派有不同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由于“罪行”太轻，摘帽后仍让他教课。他业务好，才让他教我们年级的基础课的大课。一些工农同学演出的这场暴力闹剧实在没有道理，可是幕后的老师（年级主任）就更阴险恶毒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在批判会上动手的场面，因此记忆犹新，内心也受到很大的震动。

5. 作诗、谱曲运动：众所周知，大跃进时毛泽东提倡群众诗歌运动，那时号召人人写诗，又组织文人到民间采风，收集整理群众的诗歌。当时最有名的要算郭沫若、周扬编的《红旗歌谣》了。而我们则在1959年末开始也要求人人写诗、人人谱曲。同学作的诗、谱的曲曾贴满宿舍的墙壁，还开了几次诗歌朗诵会。这种活动在当时是作为融入革命浪潮，向工农学习的一种教育活动而开展的。这是指一般群众的作诗作曲活动。而比较专业的团体如北大管弦乐队等，则排练了全套的歌剧“洪湖赤卫队”，我班的王理同学就是其中的一名主力。反正北大人才济济，给他们时间，什么活动都可以搞得很专业。

6. 投入社会政治活动：我指的是像为准备建国十周年庆典很多同学花费大量时间进行队列练习，大部同学参加了建国十年的庆祝晚会跳集体舞，为支持古巴革命反对美帝搞的多次游行示威等等。有一次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还见到了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致使同学们欣喜若狂。当然，这些活动也有好处，即能使同学们有机会投入到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去，缺点是耽误时间太多。那时是讲政治挂帅的，当然谁也不敢反对。直到大约两年后，陈毅在广州的讲话才明确了知识分子必须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对学生来讲就是有六分之五的时间学习、上课。但这是后话了。

顺便插一句，由于当时强调阶级路线，这样的政治活动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参加的。有些同学因为出身不好，或被怀疑有问题，想参加这类活动也不被允许。我自己就有一次这样的经历。那是四年级下学期的事，在后面再仔细说。这里想提一下数二班的张××，因为祖父是大名鼎鼎的张东荪，一次参观什么展览会，大概跟军事有关吧，在出发前半小时左右，团支部书记突然对他说：“根据上级的有关规定，你不能参加

这次活动。”至于根据什么规定，为什么他不可以去参观，是不作任何解释的。这样就给这个同学造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觉得自己是政治上的贱民。

7. 学习政治文件：1960年国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式出版发行。同学们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热爱，半夜裹着棉被到新华书店门口排队，为的是能够买到一册。大约是从1960年底开始，我们班级开始了学习毛选四卷的高潮。我通读了毛选四卷后，对于后面的几篇文章颇感兴趣。比如《论人民民主专政》，“‘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底下解释什么是“人民”，看了看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可我想，1956年中国已经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还有“定息”二十年之说，可反右时怎么又把已经不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其知识分子划为敌人了呢？《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反复提到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是否就是后来的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呢？《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毛泽东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附带说一下，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毛的这句话不正是登峰造极的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吗？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颇显滑稽。再联想到当时农村出现的大饥荒，使不少人非正常死亡（这是以后才知道的），这不是矛盾吗，等等。谁也不能不承认，毛泽东的文章铿锵有力，文采飞扬，但多想想，总会发现不懂的东西，这就是后来批判我反对毛主席著作的一个根据。我崇尚独立思考，自然就会吃苦头。

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学习《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主义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三篇文章，重点在反修。那时还没有公开认为苏联是修正主义，只是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为靶子。我从图书馆借来了南共纲领草案，对其中的“人类创造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不可逾越的”言论很感兴趣。我认为马列主义不是教条，当然它也就会发展进步。说马列主义是不可逾越的显然是把它说成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东西。这绝不是马列主义，而是教条主义。这是后来批判我支持修正主义的一个论据。

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学习了很多其他政治文件，不在这里赘述。

8. 参加体力劳动：我是赞成学生适当参加体力劳动的，这对学生的身体发育和了解社会都是有益无害的。但是参加劳动要适量，不要造成对学习过大的影响。

我们上大学的前一年半，参加了过多过重的体力劳动，其中在1960年10月开始

的为期一个月的十三陵修铁路劳动是最艰苦，印象最深刻的。这次劳动的任务是挖土石方，每天劳动七个半小时，上下班还要走大约三个小时的路。而且粮食不够吃，一天下来真是又累又饿。不仅如此，劳动还要搞竞赛，又有啦啦队助威，可以说对每个人都是对身体极限的挑战。有时晚上收了工，还要政治学习，主要是批判粮食不够吃的言论。明明肚子饿的直叫，还不许说不够吃，说了就是反动言论。我们班方肇满同学就是由于累、饿、医疗不及时惨死在十三陵筑路工地上。等一个月劳动过后，我的体重由70公斤减少到不到50公斤，洗澡时看到自己骨瘦如柴的样子已经不认识自己了。

八、“劳逸结合”了

十三陵筑路劳动结束了，我们于1960年11月14日返回学校。又过了大约两三周，系里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劳逸结合”的指示，即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也称“十二条”。其中的第十一条是“认真实行劳逸结合”，虽然是针对农村中的问题写的，但其精神适用于各行各业。这一条的原文是“实行劳逸结合，保证足够的休息和睡眠时间。必须坚决保证社员每天睡足八小时。可以实行男社员每月放假两天、女社员每月放假四天的制度。农村中的一切活动都不得侵占社员的睡眠和休息时间……”等等。

“劳逸结合”指示传达以后，学校里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主要的是承认了我们正处于一个“困难时期”，也承认粮食是不够吃的了，因此要减少不必要的各种活动。前一年半搞的各种革命活动都停止了，体育课也减为一节，后又完全取消。文件传达以后，同学们都很高兴，毕竟有了较多的自由活动时间了。当然，造成困难的原因仍说成是“大规模的天灾加上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等，人为的因素说成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但尽管如此，实事求是的作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大家普遍认识到过去搞的“教育革命”、“编红书”是不对的，正常的课堂教学秩序得以恢复，从这时直到毕业课堂教学基本上没有再受到冲击。

对于同学们来说，特别是对于我和所谓“落后”同学来说，“劳逸结合”是一次解放。我当时感到异常兴奋，虽然还背着思想反动的包袱，但似乎又看到了前途。听说有的同学激动得竟在夜里徒步走到西直门，又徒步走向学校。

九、“民以食为天”

“劳逸结合”以后，政治上宽松了。同学们的真实思想也就能有所表现，谈吃的现象明显增多，当时叫精神会餐。今天的读者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可能会说我们太庸俗，低级趣味、没出息。可是我不这样想。我真正感到古人讲的“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如果只是一天不吃饭，谁都能忍受；就是饿上几天，也都能挺过来。但若让你长年累月地吃不饱，吃的念头就会逐渐占据你的头脑，挥之不去。这大概就是人作为动物的一种本能。过去儒家讲女人守节以饿死为最难，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十三陵劳动的后期，就发现有的同学有腿部浮肿的现象，回校后，这些同学到校医院检查都说是由吃不饱引起的。听说校医院给这些同学一些黄豆、白糖，吃了后都有好转。“劳逸结合”以后浮肿现象越来越多，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应对粮食的缺乏，学生食堂研究怎样能用较少的粮食做出看似更多的饭食，当时叫“增量法”。又从树叶、藻类等寻找可供食用的部分，以补充能量的不足。但这些方法都没有起到什么效果。那时还盛传毛泽东不吃肉了，意思是说领袖都和百姓同甘共苦了，要大家以积极态度来度过困难。我每个周末回家总要吃顿饱饭，虽然这是父母的疼爱，但他们就要少吃挨饿。今天想来内心还感到温暖。

这时食堂里经常发生少交饭票、做假饭票的现象，后来改用饭卡，又多次发生涂改饭卡的事情。这种现象被抓住当然丢脸，有的还给了严厉的处分。我虽然没干过这样的事，但也有趁熟悉的同学帮厨卖饭时让他给舀一碗稠一些的粥的时候。直到今天，我对于浪费粮食的现象仍十分反感，在某些学校食堂看到学生们吃完饭用馒头抹抹嘴就扔掉了，心里真不是滋味。

十、甄别工作

196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做好干部甄别工作》的指示，决定“对1959年以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也是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次序来进行。大约在1961年初冬，我年级党团组织对于在1959年底八届八中文件学习时被重点批判的近十名同学进行甄别平反，其中也包括我。记得是自己先陈述，然后组织上宣布对你的批判是错误的，给予平反。我当时说了有一个多小时，代表组织的团支部书记很耐心地听，之后只简短地宣布给我平反的结论。这使我当时感到有些窘。本来我还以为要就批判的问题一条一条地讨论，因此说得很

详细，哪知只是简单地说批判搞错了，恢复名誉就算了。至于什么地方搞错了，怎么搞错的，完全不涉及。后来我还经历了一次平反，也看到过多次给别人平反，也是同样的模式。这使我感到，共产党搞整人，都是无限上纲，非批倒斗臭不可，但平反都是一风吹，不做任何解释。

这次平反对我简直就像是一次解放。我感到自己又回到同学中来，不再是另类，和同学们逐步恢复了以往的交往。不久，又选举我当团小组长，就感到是真正回到群众中来了。🔴

我的大学（二）

——政治宽松的两年

大学的三四年级（严格地说，是从二年级下学期到四年级下学期初）是政治上比较宽松的两年。由于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品严重短缺，学校里实行了“劳逸结合”的政策。首先是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大幅度减少，除了必修的政治课（按规定必修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共三门）外，政治运动基本取消，只有每周六下午的“形势与任务”报告会照常在大饭厅举行，其他会议就很少了。业务课程基本没有削减，但由于一、二年级搞跃进、“编红书”时基础课没有学好，我们在三年级第一学期还补学了应该在一年级学的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同学们业余时间多了，休息当然也就多了。但很多同学由于吃不饱，害怕能量消耗过多，思想上比较消极，不愿意参加使用体力的活动；甚至有人没课就躺在床上，算计多少粮食能产生多少千卡热量，能支持多少体力活动等等。但多数同学精神仍比较振奋，学习努力，企图先补上一二年级落下的功课，再学好三四年级应该学的功课。我自己也是属于积极派的，决心努力学好数学课程，并且还有计划地读些课外读物，以尽快丰富自己的数学知识。

从政治思想方面来说，由于集体政治活动的减少，对同学们的管控放松了。这使得同学们平时说话顾虑少了，敢讲真话的越来越多了。甚至有些人在谈到过去时，对大学前两年中经历的荒唐事情也敢于提出批评、甚至讽刺挖苦，不大顾虑以后会不会还被批判。少数同学甚至还表达了追求言论自由和社会民主的明确诉求。在这种形势下，党团组织认为，同学们在思想上颇为混乱，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既然不能再搞

运动，就采取号召同学们彼此多谈心的方法，以一对一的方式来解决“思想问题”。并且有意识地派所谓思想较进步的同学找被认为思想落后的同学谈心，以帮助落后同学“进步”。因此，一到周末，总可以看到校园里有一对对同学在散步、谈心。我自己就十分积极地参加了这种谈心活动，在我所在的数学一班里，有半数以上的同学都和我单独谈过心，通过这种方式，我也交了很多朋友，对同学们的思想情况也有了较深的了解。我和同学们的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有交流业务学习经验的，有交谈大学生应该怎样全面发展的，有谈生活问题的，当然也有谈论政治方面问题的。在谈政治问题时，当然免不了会谈大学一二年级时的政治批判以及大跃进时的过左行为，于是就会有当时党团组织认为是错误甚至反动的言论冒出来。这到了两年后又强调阶级斗争时就成了新问题，再次挨批。

就我个人来说，甄别以后虽然对党又恢复了信任，思想也是积极向上的，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坚持独立思考的信念，不愿意做党的驯服工具，就又慢慢离党越来越远，最终又犯了更严重的错误，以至于在毕业前被定为“反动学生”，遭到了更加严厉的批判。那么，我在这政治宽松的两年里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呢？今天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数学学习方面，为了与同学们能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我倡导组织了“学习小组”。这是三年级初的事，最初有五位同学参加，每周活动一至二次，一共持续了一年。

第二，在和同学们谈话时，涉及比较广泛的政治问题，也如实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当然有不少与官方不同的看法。这在后来批判我时被指称为是有意传播和散布反动言论，并且把同学们的思想搞乱，与党离心离德。

第三，更为严重的是，企图并筹备办所谓的反动刊物《青年论坛》，被指称是做反党的舆论准备。

下面，我逐一加以详细说明。

一、组织学习小组

组织学习小组的背景有三个方面。一是前面提到的在所谓“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造成同学们的消极慵懒情绪影响了业务学习，这种情况需要改变；二是在大学头两年由于搞大跃进和其他政治活动使得基础课没有学好，需要补课；三是政治方面出现

了新的、有利于学生学习的局面，具体地说即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所改变，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在广州讲话，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史称1961-1962年是所谓知识分子的“小阳春天气”。在这种形势下，一二年级时的革命的狂热已经消退，社会和学校里的风气也渐趋实事求是，从过去把学习等同于“白专”到理性地承认“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这都使得同学们敢于理直气壮地搞好业务学习。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联络了几个同学在1962年2月组织了学习小组。为了能搞好这个活动，在小组成立时，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讨论，并订立了公约，选举我为组长。开始时小组有五名固定组员，到一年后小组停止活动时有10名组员。另外，我们还一直采取开放政策，欢迎非组员参加活动，但只听不讲。前后参加过我们活动的有20多位同学，他们都对小组的活动表示赞扬。

学习的内容首先是补习基础课，每周利用一到两个晚上，由同学轮流讲解指定的参考书，然后进行讨论。我们系统地补习了一二年级时学的解析几何、数学分析、高等代数三门基础课，参加者感到收获很大。另外就是交流学习心得，采取的形式一是讨论，比如针对所学定理的深入理解，较难习题的解法分析，甚至上升到对于学习数学一般性方法的探索、理解和体会等；二是强调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和自学能力，鼓励写作并报告小论文以开拓知识面。至今我还记得在补数学分析时，我曾对吉米多维奇的习题集中的几道难题做了总结，写成了短文《如何解函数方程》，在小组内报告，并进行了讨论，同学们表示很有启发。另外，对于学习数学的一般方法，我提出了要摆正理论、方法、技巧三者的关系，顺序是先理论，后方法，最后是技巧。要重视做题，但不能陷入题海之中，特别是不能陷入只训练技巧性的题海之中的思想。学了新的东西，首先要从理论上深入分析，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要知其不得不然。为了检验是不是理解了理论，才去做题，做难题。我的这种思想，对于我以后的数学学习，带来了很大益处。当然，其他小组组员也谈了不少他们的学习经验和体会。

由此看来，可以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小组对于当时同学们的课业学习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也创造了同学们在学习上互相帮助的新形式，是应该肯定，并值得提倡和推广的。

在小组活动期间，党团组织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有一次，团支部书记对我说，你们的小组也不要完全搞业务学习，也要学些政治，我同意了他的意见，并且加入了学习《中国青年》杂志上政治文章的内容。

我到今天还认为，这个小组是我在大学期间做的一件好事。而且，说良心话，我也没有任何私心，只是想和同学们一起学好数学。然而，到了一年以后，由于我筹办青年论坛的问题受到批判，成了组织上关注的问题同学，这个小组被迫解散了。在后来对我的批判中，这个小组也受到了批判，并被说成是反动组织。当时说我“白专”者有之，说我“想成名成家”者有之，说我向同学“散布白专思想”者也有之，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最后结论性的批判竟称这个小组是为我在将来“篡夺党的领导权”所做的组织准备，多么荒唐！

二、谈心活动暴露真思想

前面提到，谈心活动本是党团组织号召的，当然希望同学们多和党团干部谈，以暴露思想，向党交心。也确实有很多同学是这样做的，包括我自己。譬如我就经常把自己与党相左的想法和团干部谈，以求他们能帮助指出我的错误，辨明是非，尽管结果常常是不理想的。我为什么这样做呢？一是认为党纠正了大跃进时的错误做法，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二是在大学前二年对我的批判得到了甄别，组织上承认了那种批判是错误的；三是相信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不会再因言而获罪；四是因为自己是共青团员，理应响应党团组织的号召，因而“向党交心”是无所顾虑的。

除了和党团干部谈心外，我也和普通同学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谈心活动。在谈心中，大家都能畅所欲言，即使谈到政治问题，多数同学也不避讳，能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在谈话中，也常有争论，大家互不相让，各抒己见，也使我得益匪浅。那时大家并不懂得，政治问题谈论深了必触犯禁区，这些触犯禁区的谈话也就成了我们后来挨批判的因由。

下面我仅就政治方面与同学们的讨论做一个归纳，而且主要描述一下党团组织认为有问题甚至反动的思想和言论。

1. 对于“三面红旗”的看法

对于“三面红旗”，归纳一下同学们的言谈和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对浮夸吹牛风的不满和讽刺。2. 对于“一切时间党安排”造成的生活过于紧张，没有休息时间不满。3. 对缺乏科学精神的“敢想敢干”的批评。4. 对农村基层干部胡作非为不满，提出最后面这点的都是农村来的同学。

对于浮夸吹牛风，同学们不仅把矛头指向社会上的“放卫星”“大炼钢铁”等不实事求是的现象，而且也批评和讽刺我们自己在“大跃进”中的所作所为，诸如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学习“大跃进”、学生编书以及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和试验超声波、半导体的闹剧，并且认为当时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人）提出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是十分准确的提法。有些思想更深入的同学则进一步认为，这种浮夸吹牛风，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提法，在哲学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甚至是“唯意志论”，因此是反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这种思潮不仅表现在“大跃进”运动中，像后来提出的“一切要政治挂帅”，以及过分强调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强调主观能动性，而不尊重客观规律性等等，都是这种哲学思想的反映。

再有，很多同学对于“大跃进”时期鼓吹的“一天等于二十年”，“一切时间党安排”并因而造成的生活过于紧张，没有休息时间表示了不满。有的同学说连美国芝加哥工人罢工争取到的八小时工作制都没有。更有甚者，有个同学竟说那时“生活得还不如罗马奴隶”，完全没有个人的自由。他们谈到宪法（1954年）第九十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作为学生，应该享有和劳动者同样的休息权利。

谈到当时鼓吹的所谓“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谈到要“力争上游”不能甘居中游、下游的宣传造成同学们吹牛撒谎的恶果，多数同学是用嘲讽的口吻。讽刺那时在“学习大跃进”、“编红书”、“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出现的可笑的现象。今天看来，这也许就是持续到今天的浮夸吹牛风的根源，说得严重一些，也是今天社会道德沦丧的根源之一。因为人能说谎，道德之堤坝就已溃败，渐渐什么坏事就都能干了。

在当时这场几乎是全民的吹牛大合唱中，对我刺激最深的还是“编红书”运动。当时一直纠缠于我胸中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自然科学有没有阶级性，二是创新和继承的关系。前者我在本文第一部分中已经详细谈过，即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我们只是重蹈了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覆辙；对后者我的观点是没有继承是不可能创新的。联系到毛泽东说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以及“要打破旧世界，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两句话，我不理解的是，“立”怎么能在“破”之中呢？“破”只能造成一片废墟，要建成高楼大厦（所谓“立”）还要经过艰苦的劳动，这不是很浅显的道理吗？

对于农村基层干部的胡作非为我不了解，对于农民挨饿，以至于饿死人的事，我

当时也不知道。这是因为我一直生活在北京，没在农村生活过。但农村同学对这方面的反映是很强烈的。有的同学讲，农村干部不讲道理，对社员态度粗暴，甚至随意打人捆人等等，我也只是听一听。正像王××同学说的，“你从小在北京待，哪里知道农村的事？”但是，饿死人的事从来没人提到过。今天想来，当时同学讲话还是有分寸的。如果说新社会饿死人，那非当反革命抓起来不可。

2. 关于教育方针的话题

同学们上大学是为了追求知识，对学习大家都是很重视的。但这和党的教育方针发生了抵触。因为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同学们自己对未来的想法是成为数学家，或者“进步点的”同学是想在将来做红色专家，这中间就有很大的矛盾。虽然经过一年级的“红专辩论”，多数同学都表示要又红又专，但对于什么是“红”也是有不同理解的。我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我认为所谓“红”就是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而所谓“专”就是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本领。很多同学是同意我提的“红”的标准的，但这和当时大力提倡的“红”就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还有很大的距离。有的同学说：如果党再犯错误，我们做党的驯服工具不是离共产主义理想越来越远了吗？

再有，教育方针明确提出要培养“劳动者”（后来又提出做“普通的劳动者”），尽管专家也是劳动者，但做专家的思想还是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因为你将来做什么样的劳动者是由党来安排的，你自己无权决定。这种批判使得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大大降低，甚至出现了“学习好即白专”的舆论，使得同学们不愿学习，不敢学习。这种错误情况在“困难时期”受到同学的批评和揭露。有同学说，既然如此，又何必分专业，何必办大学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在后来的“文化革命”时期，毛泽东自己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停办大学多年，造成人才培养的断层。

另外，要“做劳动者”，就要求学生在学习期间参加体力劳动。我个人觉得参加劳动是应该的，有益无害的，它起码能起到锻炼意志的作用，对了解社会也有好处，但体力劳动不可过多过重。而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每学期都安排去农村的劳动，总有一两个月吧，显得有些多；也有劳动过重的情况，我印象最深也是最累的一次劳动是二年级初去十三陵分校（时称200号）的修铁路劳动，这在前面已经提及。当时同学

们不敢表示不满，可到1961-1962年的困难时期，就有很多同学把这种不满发泄出来了。

同学们谈的最多的还是希望能够正常上课，补上前两年搞革命时耽误掉的基础课。毕竟大家上大学是为了学习知识；考数学系，是因为对数学有兴趣，大家普遍有学好数学的愿望。而且因为经历了大学头两年所谓教育革命的胡闹，都迫切希望能有正常的教学秩序。对这方面，学校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大概是在1962年初吧，学校领导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要保证5/6的时间用于业务学习”，而且，从此以后，一直到毕业，业务学习一直没有受到大的干扰。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在1961年9月党中央发布了《高校六十条》，其中第三十条中明文规定了要“严格执行中央关于保证知识分子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在业务工作上的决定”。这个使同学们皆大欢喜的《高校六十条》的出台在中央高层是有斗争的，为了理解这一点，要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说起。而在阶级斗争主导一切的时代，知识分子政策是与知识分子的阶级定位直接相关的。

具体地说，就是：知识分子属于什么阶级？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分子呢，还是属于资产阶级？这在当时也是同学们谈话中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官方的说法是不断变化着的。在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明确地指出，“建国后，由于党对知识分子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已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力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这个报告很快被收回。在同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说“在现在的知识分子中，一般说来，只有5%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他们已经处于孤立的地位；此外，还有百分之十几的缺乏政治觉悟或者思想反动的分子。”这样一来，就有大约1/5的知识分子是反动的。这与周恩来的报告已有很大不同。而到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毛泽东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上又发生了很大转变，抛弃了民主革命时期对知识分子是“劳动者”的定性而把知识分子归入资产阶级范畴。这样的定位是同学们不能理解的。大家认为，必须有剥削行为才能算作资产阶级，而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大学名教授等）拿高薪外，和工人的薪金水平是极为接近的，是没有剥削行为的。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当然也是劳动者。

谈到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这又联系到阶级斗争和阶级立场问题。

3. 关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话题

在整个大学阶段，一直是非常强调阶级斗争的。开始是宣传所谓“报恩思想”，即对于工人和贫下中农出身的同学，宣称没有共产党你们是上不了大学的，因此必须要感谢“党的恩情”，这也把剥削阶级或职员出身的同学们晾在一边，同时造成了贫下中农出身同学的优越感。贫下中农出身的同学学习不好，要学习较好的同学专门辅导，搞所谓“一帮一，一对红”；他们学习不好，还不允许老师批评。前面提过，一年级上学期对程庆民先生的批斗就是因为他上课宣读考试分数时从高分读到低分，使得一部分没考好的工农同学心中不满，认为他看不起工农同学。再加上程先生当时是脱帽右派，工农同学为表示阶级义愤，竟对他动起手来，以至于系方更换了几何课的授课老师。

那时的政治学习总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泽东 1957 年讲的话），要加强阶级观点，提高阶级意识。出身好的不能光有报恩思想，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和剥削阶级做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出身不好的要和家庭划清界限，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程庆民事件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胜利。一年级末对重点同学（包括我）的批判是打退了资产阶级对党的总路线的进攻，等等。到了 1962 年底宣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文件时，更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

我对于这些做法是很想不通的。为了反驳这种说法，我和一些同学找到了列宁的阶级定义。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了）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10 页。）

对比我国的情况（按照官方说法），1949 年已经建立了人民的政权，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55 年已经在全国范围实现了农村合作化，1956 年又完成了公私合营，1957 年反右斗争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定息 20 年的政策已经取消，也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也已经消灭，1958 年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小资产阶级（农民）也已经消灭。这就是说，在我入大学以前，就已经消灭了阶级（列宁意义下的）。为什么还要如此强调阶级斗争呢？我对此很不理解。我的这种思想后来被批判为否定阶级斗争，宣扬超阶级概念。他们的理由是，尽管我国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剥削阶级虽然失去了剥削的手段（生产资料），但他们人还在，心不死，随时都有资

产阶级复辟的危险。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按照列宁的阶级定义，阶级是个经济学的概念，剥削阶级既然已经没有了生产资料，就无法进行剥削了。因此，列宁定义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即使原来的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也只能算是剥削阶级的残余，兴不起大浪。这时还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声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只能破坏人民的团结，影响经济发展，是“左倾幼稚病”的表现。由这种认识产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以至于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现象，就造成了反右斗争以后运动不断，“整人”不断的恶果，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缓慢，人民之间“内斗”不止。我的这些想法在和部分同学交谈时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更进一步，我觉得反右也是错误的，于是提出了“重新估价反右斗争”的口号。我觉得既然资产阶级已经消灭，还哪里有什么“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呢？反右斗争反的只有两种人：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和知识分子。前者是为了建立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后者是基于把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诚然，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政党，但资产阶级已经消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共产党可以解散这些政党，不必用斗争方式使其归顺，成为共产党的花瓶党。而知识分子是搞经济建设的一批不可或缺的生力军，把他们统统归入资产阶级，不予信任，不予利用，则是造成1958年荒唐的大跃进的重要原因。从长远来说，毁掉大批学有专长、有建树的知识分子实在也是对历史的犯罪，它将使中国的发展倒退数十年。从道德建设上说，它造成了说假话的风气，鼓励“告密风”，使得惯于“窝里斗”的中国人内斗成风。我认为反右斗争无论对人民，还是对共产党来说都没有好处。在当时的所谓“困难时期”反思大跃进错误时，必须同时反思“反右斗争”的错误。我的这些主张也和若干同学谈过，基本上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同学们赞同我的观点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大家都经历过一年级时左倾同学批判程庆民老师的事件，这个事件使同学们感到反右斗争“不人道”，“不近人情”，有违人道主义的原则。

作为后来批判我反对阶级观点的言论中，最严重的是，我在1962年提出了“三无政治”的主张，即在大学里实行无政治学习、无政治运动、无政治思想工作。我认为这些活动都是基于中国社会仍然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而产生的。比如毛泽东就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

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因此在政治运动中要制造阶级敌人，这就冤枉了大批好人，走上了“运动，批判，几年后平反；再运动，再批判，几年后又平反”的怪圈，在人力物力上都是巨大的浪费，社会也变得不正常了。而政治思想和政治学习无非是灌输错误的阶级斗争思想的方法和手段，它们的目的是非是让每个同学都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这有悖于独立思考的精神。这是我提出“三无政治”主张的原因。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至少也要减少政治活动的时间。我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实在是太过大胆，但也博得了部分同学的共鸣。在毕业时对我进行重点批判时，我的这些言论被冠以“反对阶级斗争理论，宣扬超阶级观点”的帽子，作为我所犯的错误的最主要根源。

4. 关于反修的话题

反修，主要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是1960年代中国政治方面的大事。在困难时期（1960-1962年），中苏并没有公开分裂，比如在一年级我们重点学习的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而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其中并没有公开批评苏联，只是强调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思想，影射攻击了所谓“戴维营精神”（赫鲁晓夫于1959年9月访美，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是投降美帝国主义；影射攻击苏联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主张“议会道路”等，但通篇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批判的靶子。

中苏公开论战是从1963年开始，最初是中共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发表了七篇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它们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然后，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发表了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开始了中苏两党的直接对峙。再以后，1963年6月14日，中共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回答了苏共的公开信，双方唇枪舌剑斗了两个回合，到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又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而中共中央则发表了著名的“九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1963年9月—1964年8月），两党关系恶化到极点，以至于最终爆发1969年的珍宝岛战争。这些都是后话。

回到困难时期同学们对于苏联和反修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1. 对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反斯大林的报告在私下传播和私下议论，对个人崇拜现象的质疑。同学们认为赫鲁晓夫是勇敢的，有人还明确表示：“我不认为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他是共产主义世界的英雄。”2. 少数同学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的议论，（注：《南共纲领草案》是在1958年正式出版的），认为马列主义是发展着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南共纲领》有胆量提出“人类创造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不可逾越的”，这说明了南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不能认为南共是修正主义。3. 苏共于1961年10月召开了二十二大，通过了第三个党纲，宣布苏联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变成全民的国家，苏共已变成全体人民的党。这个党纲在《人民日报》上是全文发表的。我们对于纲领中提出的人道主义口号很感兴趣，譬如“建立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是同志、朋友和兄弟”，“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等等，这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推出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有天壤之别。由此我认为，“马列主义基本精神是贯穿着人道主义精神的”，“革命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一个马列主义者，一个革命者，首先是一个社会上正常生活的人”等等，而我的这些说法得到了很多同学的赞同。

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在中苏分裂，公开反修时，我们则一边倒地倒向苏联，认为中国共产党犯了路线错误、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种思想也造成了1963年林××逃往苏联在边境被抓的悲剧。（林后来被判九年有期徒刑。）

囿于当时的教育和我们能接触到的书籍、报刊，我没有发现我们同学中间有质疑共产主义的人。我们支持苏修，是认为他们的政策更接近共产主义的理想。其实，谁也没有去过苏联，只是因为对中国当时的政策不满，又看到了苏共新纲领的诱人的口号，就认为苏联好，苏联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5. 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索

同学们在联想到三面红旗的错误，反右、反右倾运动的偏差时，也在思索产生这些错误和偏差的原因，从而对于中国的社会制度有很多思考。比如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民主，人代会制度不是真正意义下的民主制度。这因为，人大代表候选人是上面指定的，选举只是走形式，这样选出的代表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有的同学说，“竞选”是真正民主的必经途径，首先是基层人民代表必须由竞选产生。可是，党对我们的教育是说，我国的民主制度是远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优越得多，他们有的只是形

式上的民主，比如多党制、三权分立、全民选举等，但他们是受大财团控制的；而我国的人代会制度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云云。而同学们说：“我们宁要民主的形式，也不要连形式都没有的所谓‘社会主义民主’”。

再说“自由”，连“散布反动言论”都可以入罪，最基本的“言论自由”是没有的。结果造成“人人屈从于‘政治压力’，不敢讲心里话”，更谈不到“自由发展个性”和“个性解放”了。如果你谈“个性解放”，就是坚持反动立场和宣扬个人主义，“争取自由”就等同于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

还有的同学谈到公平、公正、法治和人权，谈到在农村人民公社当个小官就为所欲为、打骂群众等社会不公现象。可以说，在同学们的谈心活动中，一些同学对于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思索并表达了不满。同学们说，难道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的社会制度吗，没有民主、自由、公平和正义？

为了求得解答，同学们去读马恩列毛的著作。他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共产主义的图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类发展的终极假想是要建立一个“共同自由”的人类联合体。我们是朝着这个方向向前走吗？

他们也看到，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一再讲：“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共夺取政权时也是说“国民党政府不民主”，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是不彻底的，而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前必须先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叫作“新民主主义革命”，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的“民主”在哪里呢？事实上，马恩早就指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否则就会导致专制和独裁，斯大林的错误就是例证。因此，同学们感到，我们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还远着呢。

也有的同学去读法国革命时一些经典作家的著作，比如狄德罗、伏尔泰和卢梭，特别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等。最典型的是同学陈××，他到我们年级以后（原在1958级），几乎所有时间都用于读《资本论》以及卢梭的书，导致数学学习多门不及格，被勒令退学。

今天看来，同学们的这种为国为民积极探索的精神真是可贵。可是，后来这些思索和讨论都被当作反动思想而遭到了批判。

6. 关于党的领导的话题

更进一步，在谈心活动中，有些同学也触及了“党的领导”这块我国社会制度最根本的基石，提出了为什么要“党的领导”这个在今天看来也是大逆不道的问题，触碰了中共最主要的政治禁区。尽管多数同学是以书生论政的态度进行理论探讨，但仍有同学尖锐地指出，党在领导国家中所犯的错误基本上是由“外行领导内行”所致，对右派言论表示赞同。更有甚者，一位林姓同学竟然对我说：“你想想，解放以后共产党做过一件好事没有？土改、镇反、肃反、反右、三面红旗……”，听得我直出冷汗。当然，这样的同学是极个别的，他就是那位前面提到的因偷越国境被判刑九年的同学。

7. 对毛泽东思想提出异议

在我和同学谈话时，特别是在分析大跃进时所犯错误的原因时，大家提出了毛泽东会不会犯错误的问题。其实，提出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因为毛主席是最高领导者嘛！

同学们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说法与我们政治课学的唯物主义是矛盾的，这已经不是“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了。又说，“尽管辩证唯物主义承认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但这是在“物质第一性”的前提之下的，而没有这个前提，这就成了“唯心主义”，甚至“唯意志论”，这是哲学课堂上老师教的呀。那么毛主席在哲学上是不是犯了错误呢？再有，强调政治挂帅也有同样性质的问题。马列主义既然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怎么可以挂帅呢？另外，历史唯物主义是强调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政治经济学也揭示出经济发展的规律性，那么，由15年超英到两年超英有什么依据呢？这不是对经济规律的挑战吗？大家谈来谈去，觉得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都与马列主义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呢？还是违背呢？再有，关于人民公社问题。毛主席是把人民公社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具体道路的，所谓“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不正是反映了他的这个思想吗？但是，政治课上教我们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呀，可公社还是“一穷二白”呢，这又是发展马列主义，还是违背马列主义呢？今天看来，同学们在议论中所持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这种议论反映了他们敢于独立思考的精神，这是很可贵的。

当然，我和同学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议论在那时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思想，只是有怀疑、不理解而已。但到后来对我们批判的时候，我们都不得不承认那时就明确认为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都违背了马列主义，这是无限上纲的结果。

总结一下，在1961—62年的政治宽松时期（由于周恩来、陈毅1962年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史称这段时期为“知识分子的小阳春天气”），我班部分同学和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中政治上较敏感的那部分人一起，对解放后，特别是反右后，党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一次反思，从大跃进时的浮夸开始，在多个方面，包括三面红旗、教育方针、红专问题、反修问题、甚至社会制度和党的领导问题进行了思考，有的方面还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如果党中央正确对待群众的反思，并从而认真克服过去所犯的错误，中国会走上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当毛泽东注意到了这点后，他在1962年9月召开了中共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指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群众的这种反思看成是阶级敌人向党的进攻，这就失去了接受意见，改正错误的机会，甚至于几年后发动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对于反思大跃进错误的人，上至彭德怀、刘少奇，中至邓拓、吴晗、廖沫沙，下至一般百姓和大学生，都遭到了打击和清算。

另一方面，我必须指出，能够反思过去错误的同学还只是一小部分，也许有1/5，也许还不到，大部分同学受到大学一二年级时强大的政治压力的影响，不敢独立思考，对政治问题浑浑噩噩，这也是确凿的事实。不指出这点是不真实的，也会给读者造成误解。全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能反思过去错误的只是少数，否则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会受到极大的阻力，甚至搞不起来。

三、我的性格特点及转变

我在这两年又犯错误，以至于毕业时受到全校（寒假）毕业生的严厉批判，除了政治思想上的原因外，与我的性格特点也有关系。主要是指两方面，一是顽固坚持事事都要独立思考，对于任何人的意见，包括党团组织的意见都要首先自己判断其对错，认为对的才听，认为错的就反对，这就被党认为是不听话的人；二是知行合一的生活态度，自己认为是对的事，就义无反顾地去做，不顾及别人以至于组织上怎么想（最

突出的事情是1962年10月开始筹备的《青年论坛》)。这其实是一种求真务实的积极的生活态度，可在当时就很不合时宜。我把自己的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叫作“行路精神”，主张光有好的思想是不够的，一定要付之以行动才有意义。觉得人活着就要做事，做好事，使自己“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是当时红得发紫的保尔的话）。为什么叫“行路精神”呢？这和我当时推崇的日本哲学家柳田谦十有点关系。柳田就是主张独立思考、探寻真理、修正错误、知行合一的，他为宣传自己的思想曾主办《行路》杂志。记得在对我进行毕业批判以前，1964年秋我所在的代数拓扑班团支部曾经对我进行了一次“团内帮助”，当时曾批判了我的“行路精神”。同学说：“你走在与党背道而驰的道路上，你也坚持要走吗？”我说：“只要我认为是对的，我就要走下去。”同学说：“如果你认为你走的路已经是错误的呢？”我说：“那我马上停下来，走正确的路。”同学又说：“你的学习小组和青年论坛都是和党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你为什么不停下来。”我说：“我还没有认识到它们是错误的。”于是同学们就上纲上线批判我的学习小组和青年论坛，不在这里细说了。

可是，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以及“行路精神”是否坚持始终了呢？没有。在后两年对我的极严厉批判中被彻底摧垮了。在政治高压下，我逐渐违心承认了很多自认为不是错误的错误，也不敢再有什么行动。为了能够求得组织上的信任，我一反常态，完成放弃了追求真理甚至实事求是的精神，编造了不少自己没有的东西。（可见本文第三部分。）可以说，对我的两年批判已经把我完全改变了，改变得没有骨气，逆来顺受，不辨是非，叫我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因此，最后对我所做的结论中说，我的“全部主要问题都是自己主动交代的”，并被“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持帽不带”。甚至到毕业离校以后我还在主动进行“思想改造”，一直到文革初期。

四、筹办《青年论坛》

1962年10月，在学习小组受到同学们的好评的情况下，我得到了更多同学的支持，再加上我的所谓“行路精神”，感到自己有宣传正确思想的责任，即所谓“我所认识到的真理也要让别人认识到”，于是内心萌生办一个刊物的念头。我和几个接触多的同学商量，觉得可以先办一个供同学们讨论问题的壁报，条件成熟后再办油印甚至铅印刊物。先在本班办，如办得好，也可发展到本年级，甚至全系，全校，以至于校外。讨论什么呢？就围绕同学们的学习、修养、生活，以及大家热议的与政治有关

的问题。取个刊名，就叫《青年论坛》吧，由我写《发刊词》，说明刊物的宗旨。又组织了编委会，有十人左右参加。并且马上就开始了第一期的组稿工作。

但事与愿违，我们的活动很快就被团支部知道了，他们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反动事件，是阶级斗争在同学们中间的反映，一定要不遗余力地阻止它的诞生。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先由团支部书记和我谈话了解情况。我说，这是根据同学们的要求建立的一片讨论大家感兴趣问题的园地，目的在于引导同学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他说，既然这样，可以和团支部合办，你们现有的编委加上团支部派过去的编委组成联合编委会，再来讨论具体的出刊问题。我说，要和编委们商量一下。但我内心里想，这下完了，我们想强调的“自由讨论”落空了。团支部会严格限制哪些文章可以发表，哪些不能发表，那还怎么自由讨论呢？回去和编委们一说，多数都不同意与团支部合办，还有两人直接要求退出了。我说，咱们好好考虑一下，过几天再开会。

第二天，我找了两个最信任的编委——陈××和张××，去颐和园开会。我们边划船，边讨论，觉得和团支部合办已是势在必行，但怎样才能保证“自由讨论”的宗旨呢？最关键的是审稿权要在我们手里，发表什么文章，不发表什么文章，要由我们决定。可这可能吗？既接受团支部领导，出刊前总得把稿件给团支部看看吧，因此，这种控制审稿权的想法是幼稚的，不可能实现的。那么，我们和团支部的办刊原则究竟会有哪些不同呢？我们分析了一下，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党在反右、大跃进时期的错误，同学们做过很多的反思，愿意谈这方面的内容，而党团组织则不希望谈这些内容。事实上，在政治宽松时期，党虽执行了新的政策，比如劳逸结合，比如5/6的时间要用于学习上，也不再有一二年级时的荒唐事情，但对一二年级的错误做法，特别是对三面红旗和大跃进从来没有公开否定过，他们怎么可能容许反对三面红旗或大跃进的言论公开出现在壁报上呢？第二，我们倡导“自由讨论”，倡导“独立思考”，而团支部是不会容许“独立思考”的。他们倡导的是“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是水火不相容的。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会议不欢而散。

接下来的几天，形势陡变。又有编委要求退出，没退出的也精神萎靡，拿不出办法。团支部书记李××找我谈话，态度强硬地说：“你是共青团员，不能和团组织讨价还价。团组织没有审稿权，那怎么体现团的领导？”我无言以对。心想，那天和陈、张在颐和园讨论的事情怎么团支部书记都知道了？这时我感到十分孤立，已经找不到

一个人站在我这边，我只好投降了。我说：“那好，就按你说的办吧！”结局是，和团支部联合只出了一期，发刊词自然是团支部写的，内容自然是如何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等等，围绕发刊词的宗旨，选了一批稿件，凑成了一期，之后就不欢而散了。

又过了几天，在一个周六的下午，数力系党总支书记陆××在数力系团员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我说：“在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还有的团员要搞‘自由论坛’，与党唱反调！”这等于给我的《青年论坛》定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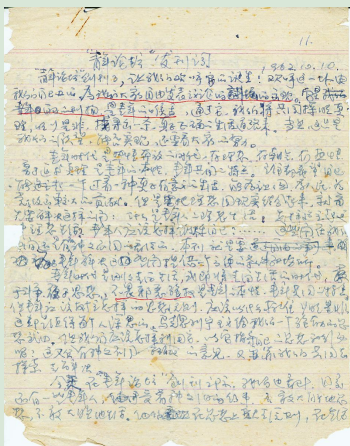
今天想来，把《青年论坛》扼杀在摇篮中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我早办一年，组织上不管，出一两期油印刊物是很容易的事，那不就成了第二个“星火案”了嘛！结局也许就是多少人人头落地了。（注：《星火》是一本由兰州大学右派学生于1960年创办的杂志，仅印出了一期，因其内容不见容于当时的政府，很快被镇压。造成林昭、张春元、杜映华（中共武山县委副书记）等先后被处决，另有十多人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五、回望《青年论坛》发刊词

由于毕业前对我进行批判时的主要罪状是筹办《青年论坛》，而且又把发刊词作为我的“反党纲领”来批。我想，今天再回望一下这篇发刊词，便于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声明：我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意思，也不认为此发刊词没有错误，无论是从现在的观点还是从当时的观点。我只是想展示一下1960年代初一个21岁的青年的梦想与追求。下面是青年论坛发刊词的全文。

“青年论坛”发刊词

“青年论坛”创刊了，让我们欢呼它的诞生！欢呼这一块由我们自己办的，为



我们大家自由发表议论的讲坛的出现。它是青年自己的刊物，是青年的喉舌。通过它，我们将共同探明真理，明辨是非，找寻出一条真正正确的生活道路来。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愿望，能否实现，还要看大家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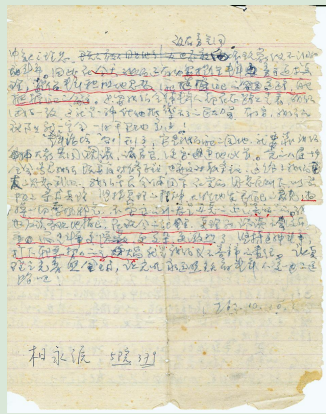
青年时代是热情奔放的时代，有理想、有朝气、有热情、勇于追求真理是青年的本性，青年共同的特点。谁都希望自己能过着一种真正有意义的生活，能为祖

国、为人民、为党做出较大的贡献。但是，要把理想同现实结合起来，就首先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什么是青年人的理想生活？怎样建立起这种理想生活？青年人应该怎样锻炼自己？……这些问题在我们中间还是有着种种不同的看法的。本刊就是要为青年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个方便的条件和场所。

青年时代是刚刚走向生活，或即将走向生活的时代，敢于斗争、敢于思想，不畏邪恶强权是青年的本性，青年共同的特点。但青年应该树立怎样的思想原则，应该以什么标准辨明是非，这却是值得每个人深思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给我们一个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地利用它，以它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呢？这又会有种种不同的意见，又要靠我们共同去探索、去解决。

今天，在“青年论坛”创刊之际，我们也看到，目前还有一些青年人，由于受着种种旧的约束，不敢大胆地思想，不敢大胆地生活。他们在思想上缺乏原则，在生活中缺乏理想，没有勇气同坏现象做不调和的斗争。因此，在今天我们还有必要提倡青年勇于追求真理，提倡青年积极地思想，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要我们全体青年人都在正路上走着，我们团结一致，这就是一种什么也抵御不了的巨大力量。有了它，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一定会一日千里地前进！

“青年论坛”创刊了，它是我们自己的园地，就要靠我们大家共同灌溉、滋育它，使它迅速地成长。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号召我们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这给了我们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号召全体同学在党的思想原则下，以积极地寻求真理、坚持真理的精神，大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扫掉一切歪风邪气，不管它的外表是丑恶的还是“美丽”的。我们也应该客观地指出，在现今的社会里，真理和谬误不会没有斗争，而是斗争更隐蔽、更复杂、更激烈了。坚持这种斗争，打下邪恶势力的气焰，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让真理之光普照全球，让光明永远照耀着青年人前进的道路吧！



1962年10月10日^①

筹办《青年论坛》失败后，正好赶上我们的数学学习也告一段落，即从基础课的

^① 这里所附的《发刊词》的照片是最初的底稿，誊清件已上交——本文作者。

学习转入专业课的学习。原来数学专业的三个班合在一起，再按专业拆成了四个班，即微分方程班、概率统计班、函数论班和代数拓扑班。我被分在代数拓扑班中的代数小班。原来数学一班的30多个同学在代数拓扑班的只有四个人，而且都在代数小班。他们是王×、杨××、李××和我。李××是原来一班的团支部书记，现在又做代数拓扑班的团支部书记。

这时已到四年级上学期末，下学期就要按新分的班上课了，一切活动也都按新分的班来进行。🔗

我的大学（三）

——最后两年的检查与批判

一、分班后的第一学期

大学四年级的下学期是我在北大近六年生活中最无所事事的半年。到了新的班级，同学们都不熟悉，我虽然努力和大家交朋友，但明显感到同学们不愿意理我，原因应该是在数一班被入另册，思想反动吧。想埋头学习吧，可课程太少，用不了多少时间。为了填补时间的空白，我又选了高年级的一门课——Lie代数，还到中文系旁听了几门课。其他时间就是看书。数学方面开始读群论，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后来就成了我终其一生的在数学上的研究方向。其他的书读得也很杂，现在还记得的是我当时迷上了古巴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和日本柳田谦十的《我的世界观的转变》。我记得，在卡斯特罗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起义失败后，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没有经历过类似时刻（注：指起义失败，起义军只剩下十八个人，而敌人又在广播劝降讲话）的人们，是不会懂得什么叫生活中的痛苦和愤慨的。我们不但感到长期怀抱的解放我国人民的希望归于失败，而且看到暴君比以往更加卑鄙无耻、耀武扬威地骑在人民的头上。”为什么这段话给我这么深的印象呢？可能是因为我的《青年论坛》被扼杀的一种联想吧。（注：至于卡斯特罗后来自己也走上独裁道路那是向苏联靠拢的结果。）对柳田谦十前面已有提及，是讲他办《行路》杂志，而我崇尚所谓的“行路精神”。这里是讲他的思想转变。他本信奉西田的唯心主义哲学，是日本西田哲学的台柱子。但在晚年他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转变，不但哲学思想转入了唯

物主义，而且还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我阅读并宣传他那本小书，就是宣扬柳田的积极的生活态度，能独立思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并最终走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既然人是可以改变的，我也是可以改造思想的。这大概就是所谓共鸣吧，我当时的处境使我与卡斯特罗、柳田谦十有了共鸣。

这个学期官方安排的政治学习主要有两个：一是1963年3月5日毛、刘、周、朱等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二是反对苏修公开化，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接着苏共中央发表对各级党组织和苏共党员的公开信，紧接着中共中央发表“九评”，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中苏论战。

现在一提学雷锋，就和“做好事”联系在一起。可那时我们学雷锋，主要是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做党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即做党的驯服工具；二是学习他的阶级斗争意识，他有一句名言：“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错误思想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特别是强调他的第四句话。当然还有他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对工作认真负责等等。

学习反修文件在那学期是刚刚开了一个头，因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时已临近放暑假，学“九评”已经是五年级上学期的事了。

这学期组织上对我没有任何批评，到了新班，筹办青年论坛的事也不了了之了。我只记得一件小事，仍使我感到政治上的压力。那是一次参观军事博物馆的集体活动，好像是参观被打下的美国U2型间谍飞机。就在出发前，团支部书记找到我，说：“根据规定你不能参加这项活动。”至于为什么不能，他没说明，我也不敢问。即使问了，他也会推到上边。这件小事就是告诉你，你政治上有问题，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后来我听别的同学说，他们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可见这也是当年党组织制造政治压力的一个办法。

二、该来的终于来了

暑假过后，五年级开始了，刚开学就发生了一件事。原数一班现概率统计班的彭××回校后，立即被监督起来，勒令其写检查，不准上课，也不准同学们与他接触。写了不到一周吧，北京市公安局就逮捕了他。至于什么原因，官方是保密的。同时，原数一班现函数论班的林××未到校上课，据说是在东北被逮捕的。对于这样的大事，尽管官方保密，同学们仍然议论纷纷。没有不透风的墙，有的同学说，林××是企图

在中苏边境越境未遂被捕的，而彭××和他是一伙的。我虽不知真假，但有些害怕，因为林、彭和我都有比较多的来往。他们都是我筹办《青年论坛》时的编委，听说要和团支部合办就都立即退出了编委会。另外，他们平时也与我有很多接触，常在一起谈论一些时政问题等等。果然，在彭被捕大约一周以后，团支部书记李××通知我要在那星期的周六晚上去五院379号房间找一位姓杨的老师。我问什么事，他说不知道。

在那个周六的晚上，我如约来到五院的379房。敲门，“进来！”我拧开门把手，看到椅子上坐着一个三十出头的人。他问：“你是徐明曜？”答：“是。”他挥了一下手，意思是让我进来。我问：“您是杨老师？”“是，知道我找你为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似乎很生气，说：“你在数一班，搞得同学们思想混乱，还要办‘青年论坛’，而且你和林××、彭××也有关系。”我说：“是，林、彭都在我们一班。”他点了一根烟，接着说：“你的问题很严重，要好好交代，彻底改造。”我没说话。他又说：“从今以后，我是你的问题的负责人，对你怎样处理，全看你对错误的交代和认识。不要想蒙混过关，人民是不可能让你蒙混过关的。”我说：“那我先和您谈谈吧。”他说：“不用谈，先写一份彻底的检查交代材料，写完交给我。”又说：“一周时间够了吧。”还没等我回答，他又说：“听说你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我告诉你，你现在的的主要任务是写检查！一周以后的这个时间拿着检查来见我，还在这个房间。”

这次谈话以后，我苦思苦想，写了一份交代材料。从一年级交心时说的不满大炼钢铁的言论到筹办青年论坛时与团支部的斗争应有尽有，凡是我认为可以算作错误的言论和行动都写了，大概有十多页吧。等待周六晚再去见杨老师。我心想，写得这么多，又很深刻（我认为），杨老师总该表扬几句吧。是不是就能过关了呢？

终于到了约定时间，我又走进杨老师的办公室。杨拿起我的检查看了看，有一两分钟吧，随即很愤怒地摔在桌上，“你不老实！就拿这个来糊弄我。”又说：“学习小组为什么不写？与林××、彭××的关系为什么不写？”我说：“我认为学习小组是好事。”“好事？你毒害了多少同学？让他们崇拜你，跟着你走！你通过个别谈心的方式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怎么不写？”“你以为林××、彭××被逮捕和你没关系，你不说他们在监狱里照样可以揭发你！”我还想说什么，哪知杨说：“首先要端正态度，回去后好好想想，把你的问题如实交代出来。不要想蒙混过关，也不要辜负党对你的挽救。”不等我再说什么，他就说：“回去吧，下周同样时间再来见我，老实交

代你的严重错误和罪行。”他这些话一下把我打懵了，我走出他的办公室，感到十分茫然。

三、越来越“深刻”的检查

离开他的办公室以后，我感到十分沮丧而无助。我自认为把什么都说了，还给自己上了纲，怎么就是不老实呢？我到底怎么写才能过关呢？按杨老师的提示，学习小组要写成引导同学走白专，与同学们的谈心活动要写成与党争夺青少年，筹办青年论坛要写成倡导所谓思想解放运动，攻击党的领导，还要回忆与林、彭的谈话等等……。想了一天一夜，我重新写了检查，这次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把自己往坏里说，而且逐条进行自我批判，上纲上线。比如组织学习小组是出于自己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与同学谈心时常常有意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党的教育方针，筹办青年论坛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党进行阶级斗争，和林、彭是臭味相投等等。今天看来，我一个普通大学生，怎能代表资产阶级？但心里想，反正这样写，大概就是认识深刻了吧，交上去再说。

又到了周六，我走进杨老师的办公室。杨看了看，说：“有进步。问题交代得多了一些，但还远远不够。你不要这样挤牙膏，一点一点往外说。”顿了一下，又说：“现在就上纲上线了，还不是时候，首先要把问题交代清楚，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你还有很多问题没有交代，比如对于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对于崇尚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言论，你基本没说。和林、彭的关系也不是那么简单吧。”我说，我都如实讲了，您给我提一下行吗？他又变得十分生气，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是给你机会坦白交代，是组织对你的挽救，我们对你的情况已经全部掌握，如果我说，能算你坦白吗？现在首先要争取个好态度！”

我无话可说，只好回去再写。就这样你来我往，过了七八个星期，问题还是没交代清楚。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了。我苦思苦想，自认为把一切都说了，可还被认为态度不老实，避重就轻。我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甚至妖魔化自己，已经不管是不是实事求是了，可是仍然得不到组织上的认可。怎么办呢？我想到，在大学期间我写了几年日记，从中应该可以看到我的思想，也应该交给组织。于是，我把日记、私人通信、以及旁听中文系课时写的文学习作等等都统统交给了组织，希望能争取个好态度。至于写检查，再做一次最后的努力吧，我把有的、没有的（只要猜想组织上认为是我有的）问题都详细按时间顺序写出来，并尽量写出（或编造）所有的细

节，增加其真实性，起名叫《对过去的清算》。我事先和杨老师要求给我两周时间，孤注一掷吧，看这回怎么样。

两周后，我拿着整整一厚本的检查交代材料《对过去的清算》去找杨老师，等着再一次地挨骂。可这次他的态度与前不同，他看了一两分钟，说：“这次写得好，有进步。让我再仔细看一下，你下周这个时间来找我。”居然没有挨骂！

又过了一周，他对我说：“问题的交代就到此为止吧，当然不可能完全彻底，如又想起什么新问题，随时来找我。你下面的任务是进行自我批判，从阶级观点、阶级立场上来批判认识，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又说：“以后你就不必定期找我了，自己写批判认识，写完，不，写完一部分就交给我。”这时，已经是1964年的1月，交代问题进行了三四个月。

在我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感到无比的轻松，总算过了交代问题这一关了。可我又想，《对过去的清算》和以前的检查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当然，这次写得很细致，细节多，在有些事情上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可是“干货”呢，并没有增加多少啊。为什么以前过不了关，这次竟然能过关了，我想了很长时间也不得其解。这个谜底的揭开（至少我认为）是在五年之后，那时正是文革清队时期。我已是唐山五中的教师，因为北大读书时的错误正被隔离审查。一天，我接待了两个外调人员，他们是调查1963年被捕的林××的事。我谈了我对林的了解，其间，外调人员问：“你是不是在他叛逃前借过他20块钱？”我说记不清了。他说：“20块钱对于你们学生来说是很大的数目吧，你也记不清了？”我说真的记不清了。另一位外调人员说：“你是借他的，还是给他的？”我说：“我凭什么给他？”第一个外调人员制止他继续问下去。

这件事之后我想，如果20块钱是我给他的，那一定是知道他的叛逃计划，给他的经济支持，那不就是资助叛国投敌了嘛。噢，这时我懂了，1963年杨老师在林、彭被捕之后一周找我，肯定是和这20块钱有关。每次交代都“不老实”，是因为我从来没提这20块钱，足足整了我近半年，虽然还是没提，但他们大概通过什么渠道终于相信我不是林××的同伙了，因此才放了我。有人会说，这只是你自己的猜测，但我反复思索，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

另外，杨老师是什么人？我从别人那里了解到他当时是北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也听说那时张磐石作为中央工作队队长已经进驻北大，搞城市四清试点。学校上层斗争激烈，杨老师应该正忙，为我的事情耽误他那么多时间，如果不是叛国要案，应该

不会由他出面。

交了《对过去的清算》，已经是学期末了。我补了补耽误的业务学习，打算在下学期开始进行自我批判。

四、大学最后一年的事

1964年春节过后，新的学期开始了。这是五年级的下学期，按照规定，学制是五年半，只剩下两个学期了。我想在这最后的一年，要做好两件大事。一是要写好自我批判，政治上要过关；二是要写好毕业论文，完成业务学习上最后一个任务。

在写自我批判方面，我处于基本上没人管的状态。年级认为我的问题上交给学校了，就没人再过问；而杨老师那边，在交了《对过去的清算》后，批判的事情就完全由我自己做主了，也不用每周见面了。他的唯一指示就是“要上升到立场问题来批判”。现在，在我面前，自我批判有两种写法：一是应付差事，按《对过去的清算》中写到的主要问题上纲上线，并不触及思想；二是带着思想改造的愿望，边学习，边认识，边提高，做到思想上有收获。但无论哪种，都要实事求是，都不再妖魔化自己。

因为总的来说我内心里还是承认自己是有错误的，至少是承认在很多问题上我的观点和党的观点是有很大差距的。那么，出于一种道德上自我完善的追求，我决定按第二种方法来写。

于是，我抱着思想改造的新的决心，同时也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再次分析了自己的思想，把那些不是百分之百相信自己是对的的思想归纳了一下，按照杨老师提到的立场问题为先的次序，列出了自我批判的如下大纲，共九个方面：

1. 立场问题。
2. 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及人性论。
3. 批判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口号。
4. 批判“独立思想”、“独立人格”论。
5. 关于党的领导，对党的认识。
6. 对三面红旗、教育方针、教改运动的认识。
7. 批判“纯科学”观点。
8. 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什么是革命理想。
9. 几点教训和今后的方向。

以上九个问题将采取边学理论，边思想交锋；边破旧，边立新的方法。而当思想上有了一定的提高，就写总结予以肯定。但主要的不在写批判，而在思想斗争和理论学习。

想得很好，可真正写的时候并不顺利。以“立场问题”为例来说明我遇到的困难。所谓立场就是指阶级立场，即在阶级斗争中你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资产阶级一边？过去检查说我在很多问题上是在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了，现在应该移到无产阶级这边来。然而，为解决这些问题，要迈出的第一步是，必须承认中国还有资产阶级，而且还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激烈斗争。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无论如何想不通的。可是，这个问题又无论如何绕不过去。而且，它也无法通过学习文件来“解决”，又不能要求组织上帮我解决，那就只好先承认下来。如果这样，根据我这个学数学的人的思维定式，必然无法继续往下走，来分析我过去的立场错误及今后如何改变立场。有人曾说我是“超阶级观点”，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我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是（1）认为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有阶级性，即存在没有阶级性的事物，比如数学真理；（2）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基本消灭，要说有也只剩残余。也就是说，我承认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而根据马列主义理论评估现在的社会，又认为阶级斗争已经基本消灭，这怎么是“超阶级观点”呢。事实上，1956年公私合营已经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定息20年政策的名存实亡已经使得原来的资产阶级没有了剥削，1957年的反右斗争又从政治上（民主党派的花瓶化）思想上（整肃了百万计的右派分子）给了资产阶级残余势力致命性的打击，怎么能认为还存在资产阶级呢？没有了资产阶级，怎么还有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还越来越激烈呢？于是，这个问题就无法写下去了。整整用了近两个多月时间，我才写完了这篇言不由衷的关于立场问题的检查。我偷换了概念，把党看成无产阶级，把一切与党的主张相悖的思想观点，包括我自己的，包括苏修的，看成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进行分析。至于上纲上线倒是好办，多年的政治运动使我早就学会了无限上纲的那几种方法。写完后，在1964年4月初，我把这份自己都不能信服的批判材料的第一部分，交给了杨老师。结果，杨老师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样，我原来想的在组织帮助下，批判自己错误，改造思想的良好愿望破灭了。

以后，写其他部分检查批判时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比如“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资产阶级的”民主与自由，这些东西怎么就是资产阶级的呢？想不通，也

采取应付的方法。这样，写自我批判的热情大大降低了，速度也大大减慢。因为无人监督，一直到1964年10月下旬，我才写完了长仅57页的批判，上交给了杨老师。可他对这份检查仍然没有任何反馈性的意见。

批判就算写完了，我原来想边写边改造思想的初衷落空了，这份检查只是对我交代的部分问题的一个言不由衷的上纲上线而已。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我的初衷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原因是，我拟批判的“错误”大部分自己就不认为是错误，怎么能够批判得既让党组织看来深刻又让自己心悦诚服呢？可是另一方面，由于多年党的教育和多年的被洗脑，我不敢也不愿坚定地认为党的路线是错误的，总想自己还是有问题的吧！这样，改造的愿望和理性的思维就产生了矛盾，于是我就陷入了长期不能自拔的思想斗争中，这是极为痛苦的事。尽管我还是一贯坚持独立思考的，可经过这段时间的检查和批判，又常常不敢也不愿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内心深处甚至还把自己放在党团组织的“怀抱里”，下意识地认为自己是“党的人”。这种矛盾的心态无异于跪着造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犯有一定程度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尽管这是在政治压力下形成的，但也反映了自己思想的不坚定性。由于这种病态心理，我写的检查自然是自己和党组织都不满意的啦。

大学的最后一年还有另一件重要事情是写毕业论文。我一直被年级同学认为是数学学得好的人，虽然这次给党委杨老师写交代、批判耽误了一年多时间，但我仍要求自己一定要努力把论文做好。从六年级上学期开始，我加强了数学学习，增加了写论文的时间，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完成了一篇水平较高的文章《关于有限正则 p -群》。但由于文革时数学杂志都停刊了，这篇文章的结果到了文革以后才得以发表。这与本文的主题无关，不在这里赘述。

到了1965年1月，在大学的五年半学习结束了，我们想该毕业分配了吧。哪知道在最后一个星期，年级主任突然宣布：我们毕业班同学和其他在校生一样放寒假，寒假后回校进行“毕业教育”。同学们虽然不理解，但也只有听从校方要求回家度假了。

五、毕业教育

1965年2月初，同学们陆续返回了学校。了解到，毕业教育主要是进行个人政治评定，要人人写一份在校期间的“个人政治表现总结”，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宣读、

讨论、修改，最后得到通过。在通过以后最重要的一步，即由党团组织给出每个同学在校期间的政治“个人鉴定”，给本人看，还要本人签字，然后放入档案，跟随终生。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配套的还有很多其他活动。下面我按时间顺序叙述如下：

2月4日至14日，组织部分同学到石景山钢铁公司劳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2月15日，正式开始毕业教育。首先是形势教育，用两周时间学习文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国内外政治形势，重点学习了四清工作“二十三条”中第一条描述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所谓“二十三条”，是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发（65）24号））；二、党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文件，包括毛主席著作《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彭加木先进事迹，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以及1964年8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为了让年轻的读者了解当时官方的政策和主张，我把重点学习的四清工作“二十三条”中第一条原文抄录于下：

“一、形势。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由于城市和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全党执行了党中央的一系列的政策，由于人民群众、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努力，我国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文化战线上，军事战线上，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近几个月来，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干部，深入了城乡基层单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我国近年来迅速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同时，进一步地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我们的党不辜负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信任和希望。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入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决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么，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必须把两年多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持下去，进行到底，绝对不能松劲。现在的问题，

是要总结过去这一时期运动的经验，肯定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以便取得更大的胜利。”（看看这里对形势的分析和我的思想有多大的差距。）

学习文件之后是端正对待毕业分配的态度。批判了7种态度：1.愿在大城市，不愿到小地方；2.愿在内地，不愿到边疆；3.愿在南方，不愿在北方；4.愿离家近，不愿离家远；5.向往舒适的生活，怕艰苦；6.愿到大单位，不愿到小单位；7.愿搞研究、教大学，不愿教中学。重点批判了不愿教中学的问题，说“每个人都有教中学的可能性”。我记得当时还请了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先生讲了他教中学的经历。

再次是清理思想。要求检查下面几方面问题，并挖思想根源：（1）正确解决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2）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关系；（3）明确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的意义，坚决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体安排是，2月22日，党总支负责人李志义做毕业教育动员，要求每个人都要进行“自我革命”，谈自己政治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做好思想检查和批判，写好“自我总结”，并配合组织完成“个人毕业鉴定”。分两个阶段，前面三周是“正面教育”阶段，年级大会与小组会相结合；后面三周是“自我检查”阶段，以小组会为主。（这时他没提最后还有“对敌斗争”阶段，批判“反动学生”。而不幸的是，我正是那个被重点批判的反动学生。）

先说“正面教育”阶段，记得大会有三次。第一次是正确认识家庭影响，会后要求每个人都把来自家庭的不良影响挖出来。第二次是形势报告，强调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会后要求把在“困难时期”的错误看法暴露出来。第三次是讲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条件，以及实现革命化、劳动化问题，还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对毛远新的谈话。配合这些活动，又听了藏族女同胞斯旺的报告（以血泪家史控诉西藏的农奴制度），红军老战士王裕寿的报告，谈长征中妇女团的事迹（谈女同学如何树立雄心壮志），以及参观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展览会等等。其间，还组织了几次年级大会，由同学代表谈感想、体会。“正面教育”阶段过后，使同学们增强了阶级斗争意识；承认三面红旗正确，承认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人人争做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3月15日，开始自我检查阶段，即做毕业鉴定的阶段。李志义又做动员报告：“为什么要做毕业鉴定？怎么做毕业鉴定？”他要求每个人都要彻底地清理思想，要分阶段地清理，比如：1959年反右倾批判彭德怀时的思想和表现；三年困难时期的思想和

表现；19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及“学习雷锋”期间的思想和表现；1963-64年反修正主义时的思想和表现等。清理后要写思想总结和个人鉴定，供小组会讨论时使用。在总结中还要表明自己是不是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因此，很多同学都表示要在第一志愿上填“服从国家分配”或“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李志义动员后，给同学几天时间来写这些材料，然后就是小组讨论了，搞人人过关。程序是，个人宣读思想总结，同学们提意见，自己修改，再讨论，再提意见，再修改，直到通过为止。因此，常常是两个同学同时进行。

进行小组讨论时，并不是那么“温良恭俭让”，常常争论得很厉害。有互相揭发的，有疾言厉色的，有要求当面对质的，有哭的，有闹的，常需要主持会议的人严令禁止，甚至休会。我参加的是代数班小组的讨论，有13个同学。一个一个地过关，花了近十天时间。我曾几次要求发言，都被拒绝了。直到小组里的其他同学全部通过了，我又要求发言，这次被允许了。我读完自己的总结，同学们提出零零星星的意见，但不能过关；修改后再要求发言，还是一样的结果。最后，到了3月25日，全年级的毕业鉴定都搞完了，年级政治辅导员焦仲林通知我，全年级同学要对我进行批判，将视我在批判大会后的表现来决定是否过关。

（作者注：写本节时，参考了我的同学唐云写的《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9级纪事（修改稿）》一文，特此致谢。）

六、批判反动学生

对我的批判是属于“批判反动学生”运动的一部分，我被要求在3月28日（星期日）晚上在年级大会上做检查，以接受同学们的批判。为了过关，我按照写《对过去的清算》的路子写了一份自我检查，把有的、没有的都包揽下来，并做了上纲上线，自以为是十分“深刻”的检查，准备一次过关。

到了3月28日晚上，通知我会议地点是在二教的一个最大的教室（具体是那间记不清了），当我走进会场时，发现教室已经坐满，我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因为我知道，力学专业同学是不参加的，他们还实行六年制，还没毕业。可那间教室至少可以坐250人哪，而数学加计算专业还不到150人。直到宣布开会时我才知道，除了数力系外还有地质地理系的约100名同学参加。也就是说这次批判会是号称全校毕业生的批判会，因为当年全校的寒假毕业生只有数力系和地质地理系两个系，这使我感到

问题的严重。

主持人宣布开会后，我走上讲台。会场很安静，我根据检查稿讲了一个多小时，其间没有任何干扰。我想，也许这回能过关了吧。还没容我想下去，在我结束检查的几秒钟后，全场突然响起雷鸣般的口号声：“徐明曜不老实！”，“徐明曜必须老实交代！”，“徐明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徐明曜！”等口号。这是我未曾料到的。我想，连党委杨××都认可的检查怎么还过不去呢？我心里很害怕。正在这时，主持会议的老师走上讲台，对同学们说：“大家已经看到了徐明曜的态度，从明天起，我们分组对他进行揭发批判，徐明曜也要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好好反省、检查自己的严重错误。”又说了时间安排。这时我才知道，对我的批判要进行一周，有全校毕业生大会（像今晚），有年级会，有小组会。对我的问题要逐条来批，分几个方面，大体有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支持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反对政治运动、要重新评价反右斗争，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组织学习小组，筹办青年论坛等。我的大会检查只是揭开了对我进行批判的序幕。这时我也懂得，为什么我检查完同学们要呼口号了，如果不表示义愤，接下来的一周怎么批判呢！

从第二天（星期一）开始，大大小小的会共批判了我五天半，直到星期六的上午。记得全校大会有两次，一头一尾；年级大会至少也有两次，是分问题找了十多个同学有准备地宣读批判稿，小组会就不计其数了。我本以为要开大会轰我的“态度”，因为说我不老实嘛，可是没有。另外小组会（我只能参加代数拓扑班的会）上还要求同学联系自己，检查有没有和我类似的思想。有的同学说起他们也有我的错误思想时，还痛哭流涕。而对于我，已经感受不到批判的火力，只是旁听而已，而且他们也不许我发言。因此关于这次批判，我也没有什么可多写的了。到了星期六上午会后，年级负责人告诉我，下午的会上我要对同学们一周的批判表个态，要感谢同学们和党团组织的帮助，我答应了。

4月3日（周六）下午，年级负责人先讲了话，宣称对我的批判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胜利，是马列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胜利，要求全体同学要吸取徐明曜犯错误的教训，今后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做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最后，他说：“经过一周的批判，徐明曜也受到了教育，下面请他发言。”我走上讲台，表示接受大家的批判和帮助，今后一定要继续进行思想改造，脱胎换骨，

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说了有一分钟吧，就下台了，全体同学也没有任何表示。这时，我知道对我的批判结束了，但是否过关，是否能毕业，还不知道。总之，听候处理吧。

就在我下台入座的时候，会场上突然响起严厉的叫声：“把反动学生、右派分子张××揪出来！”，接着看见两个同学架着张××上了台，全场又响起“打倒反动学生张××”的喊声，一位同学（我不认识，大概是概率班的吧）上台发言，他读着已经写好的批判稿，大约讲了20分钟左右。内容无非是张的思想如何反动，1957年被定为右派，送电子管厂劳动改造，因为表现较好，学校允许他回校继续读书（到我们年级），以完成学业。但回校后不思悔改，继续散布反动言论云云。他发言后，年级负责人宣布：给张××戴上“反动学生”帽子，劳动改造，以观后效。然后大喝：把张××押下去！张即被带走。后来知道他被送到南口农场劳改，文革中的1969年又被送回北大参加文化革命，后来与1964级同学一起分配工作了。

批完了反动学生张××，年级负责人说，我们请到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和×××同志（姓什么，忘记了），请他们介绍林××和彭××的案情。林、彭二人是数一班在1963年秋被捕的两位同学。检察院的同志说，林于63年夏于东北中苏边境企图越境，在边境被捕。他交代，要到苏联学习革命经验，在国外组织新的中国共产党，彭××与他里应外合，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他们在北京高校中组织了“北京高校反革命集团”，罪行严重等等。（后来得知林××被判九年徒刑，彭××被判三年徒刑，刑满均释放。后，二人均入党，林在1995年还被评为福建省优秀共产党员；彭曾担任湖南省长沙市环境保护研究所所长。）在检察院同志介绍完林、彭案情，主持人宣布散会，但要求我留下来，检察院同志要找我谈话。

我被带到一个小房间里，他们和我谈的大意如下：1. 我的问题很严重，今后要努力进行思想改造；2. 林××曾打算把我拉到他们的组织中，如果加入了他们的组织，性质就完全变了，因此我也是非常危险的；3. 北大的革命师生坚决要求给我戴反动学生帽子，几上几下，最后是由一位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决定不给我戴帽子，因此，我要感谢党的挽救。

七、批判以后

对我的批判活动在4月3日结束以后，我仍然不知道对我怎么处理，是让毕业，

还是不让毕业呢？如不让毕业，是在校劳动，还是到工厂、农村或其他什么地方去呢！应该不会到劳改、劳教单位吧，因为已明确告诉我不戴帽子嘛。接下来的一周还是有不少活动的，如果不明确说，我参加还是不参加呢？另外，我的个人总结和鉴定还没做呢，到底什么时候做呢？也没人找我。

到了4月8日，数学专业同学要举行毕业教育总结大会，这个会通知我去参加。但会上也没说我的事，只是有5位同学发言，谈毕业教育的收获体会。再有，就是系主任段学复讲话，要点是（1）工作岗位是无所谓高低的，主要的是把工作做好。这是国家对大学毕业生的要求；（2）中学数学是仅次于语文的课程，与语文、外语构成三大主课。要注意中学生的全面成长，又要使学生打好数学基础；（3）学习雷锋同志说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北大同学在任何岗位上都要谦虚谨慎，不要志大才疏。要既有志，又踏实等等。段的讲话明显的是讲教中学的问题，说这不算屈才，暗示我们的毕业分配方案中将有大量同学去中学工作。（这种情形在文革前我系毕业生中是没有的。）可我早已不管这些了，我关心的是去劳动还是去工作的问题。会后，各班照相留念，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班长李生训主动拉我去照相，我说我不去了吧（因为不知道能不能毕业），李生训很诚恳的说，为什么不去，大家都在等你呢！我勉强跟他走过去，站在最后，目光呆滞（现在还存有照片为证）。事后我想，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同学敢理我了，今天李生训找我照相，是不是说明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呢？就是说，我已经不被看成阶级敌人了，因而也有被分配工作的可能呢？

大约在4月10日左右，团支部书记李××正式通知我重新写个人总结，准备做毕业鉴定。又说，4月12日晚将召开代数拓扑班团支部会议，讨论是否要对我进行处分的问题，我必须参加。到了那一天，我参加了团支部会，组织委员张××说：“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可徐明曜作为团员，不但没有做党的助手，反而做了不少反对党的事情，建议给予团内处分。”接着不少团员都发了言，几乎一致要求给我开除团籍的处分。我知道这已经是早就定好的，我为了争取好态度，以争取毕业，最后发言说：“我将行使作为团员的最后一次权利，同意开除我自己的团籍。”会议结束了，以全票同意的结果报请北大团委开除了我的团籍。

4月12日到15日，我重新写了个人总结。说实话，这次我是在一种愤懑的情绪下写的。我想，连那份已经妖魔化自己到无以复加程度的《对过去的清算》也不合你

们的意，我就干脆来个“要什么给什么”，按照批判大会的发言，稍微整理一下，怎么批的就怎么写，完全不管自己的真实思想是什么，不管是否实事求是，花了三天时间，写成了《个人总结》，交给了年级负责人。我记得他连看都没看，就给了我一份党组织写的毕业鉴定的草稿，让我看，是否同意，如不同意有什么意见。看来走的程序是和其他同学一样的。我看了看，第一句就是“该生有系统的反动思想，在学期间有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活动。”接着罗列我的反动思想及活动，诸如反对毛主席和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反对三面红旗、教育方针等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支持现代修正主义等。活动方面有组织学习小组宣扬白专道路，筹办反动的青年论坛，后被组织制止，结交反革命分子林××、彭××，与他们臭味相投，共同散布对党的不满等。最后有一句正面的话：毕业教育时在党团组织和同学们的批判和帮助下，能认识错误，并要求毕业后到艰苦地方锻炼自己。我看了这份大概北大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对毕业生这样负面的鉴定，一言未发，默默地签上“同意，徐明曜”。从此，一直到离校，再也没有官方负责人找我，毕业批判这一页算正式揭过去了。

八、重读“个人总结”

下面是根据“个人总结”留的底稿重新打印的个人总结全文，重读一下，也是“奇文共欣赏”吧。

个人总结 1965.4.12

我于1959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学习。五年半中，由于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和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带着个人成名成家的罪恶野心，又拒绝了党团组织的耐心教育，走上了反党反人民的罪恶道路，从61年起干了不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事。今天，总结五年半来所走的歧路，认真吸取堕落的教训，对于今后的改造是有益的。

入大学前，我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和观点。那时的思想情况概述如下：

我出身于高级职员的家庭，父亲在“三反”时因泄露国家经济情报曾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判处机关管制二年。判决后，他不服罪，多次发泄不满情绪，向我灌输了大量的反党思想，使我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如说：“共产党政治上最毒辣，比国民党还坏”，“中国没有民主、自由”，“现在还是官向官、民向民”，等等。

57年反右斗争时，我与部分右派言论发生共鸣。如“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教授治校”，“中国不民主、不自由”，“要求个性解放、个性自由发展”等反动言论。并且很欣赏右派分子谭天荣等的“才能”，从感情上同情右派分子，对党发生了怀疑和不满。

58年，党公布了教育方针，学校里开展了“红专辩论”，这与我当时已经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思想发生了巨大的矛盾。但我未能接受党的教育，改造自己的思想。相反地，竟借病休学，后又退学，离开了革命队伍，做了革命事业的逃兵。

58--59年在家养病一年。这一年中，一方面，我的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思想又有发展，从想当科学家发展到想当“通才”，甚至当“政治家”；另一方面，在政治上，由于对现实开始不满，有意追求资产阶级的政治，读了大量的资产阶级哲学、政治书籍。以虚伪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武装了自己，作为向党进攻的工具。这时，我还想组织“少年毛泽东学会”和“青年真理党”作为理论上、政治上向党进攻的组织形式。

由此可见，在入大学前，我已经有了较自觉的反动立场和明确的资产阶级政治观点，从政治上已经开始了反党的准备。

入大学后，在八中文件学习中，我暴露了一部分反动思想。比如，认为“炼钢是得不偿失”，“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高产卫星都是假的”等对三面红旗的错误看法。同时也暴露了一部分反动的政治观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我当时暴露这些问题就很难说有什么解决的愿望，因为我并没有把思想全部交给组织。像当时很突出的问题——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思想，我就避而不谈。而且，批判后，我没有接受同学的帮助，相反地认为这次批判是“无的放矢”，批判的问题都“不是”我真正的问题。自己根本不从立场上去检查，反而对此批判怀恨在心，以后“什么话也不说了”。这样，我就拒绝了组织和同学的帮助，拒绝了思想改造，使我的反动立场和观点隐蔽地发展起来。

在大学头两年的其他运动中，我采取的态度是消极抵抗。会上往往讲些漂亮话，但不暴露思想；会下则消极怠工，不好好干。总的思想情况是对于当时的各项运动有着各种各样的抵触、不满和极端错误的看法，并因此对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反党思想也急剧地发展起来。这些具体的思想在以后困难时期都暴露出来了，把它放在后面叙述。这里想总结一下，为什么在革命的形势下和革命的集体中，我却发展起反革命

的思想呢？这是很值得吸取教训的。今天看来，最根本的一点是我坚持反动立场和思想观点，拒绝思想改造所致。首先，我坚持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思想不放，认为党妨碍了我的理想，是社会主义革命妨碍了我的自由发展。因此，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产生不满甚至仇恨，这种不满和仇恨随着运动的发展、革命的深入越来越加深，形成了系统的反党思想。其次，由于我拒绝思想改造，极端的狂妄自大，根本不相信组织与同学们的意见。对于同学的批评恩将仇报，怀恨在心，还搬弄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自由、平等”等旗号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进一步纵容自己反动思想的发展，以至于堕落到如此地步。

从60年冬天起，我国遭遇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我是很高兴的。党公布了一些新的政策，也检查了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我更等待着党从根本上来个改变，放弃掉革命，以解决“我同党的巨大矛盾”。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我采取了观望态度。但观望的结果是，我认为党只承认了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而不承认路线的错误；61年后党的政策是为了收拾残局而对人民的让步，党从本质上并没有改变。而且这时，特别是甄别工作以后，我还认为群众普遍对党不满，党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了，形势对我有利。所以从61年底起，一方面“恢复了过去的理想”，继续坚持并发展了个人主义成名成家的野心；另一方面，由反动立场所驱使，开始放肆地散布反党言论。又从个人的政治野心出发，从62年起，喊着所谓“为了我的事业”，猖狂地同党“争取群众”，组织反动组织，筹办反动刊物，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道路。

下面简述我的反动思想、言论和反动活动。

一、反动思想、言论：

1. 反对党和领袖毛主席的思想和言论：

(1) 污蔑党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害人民”的：我由于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只看到解放后自己家庭生活降低了，就不顾事实地污蔑党不顾人民生活。特别是困难时期，认为党坚持搞三面红旗，犯了路线错误，从而使经济遭到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等。我还从自己个人主义的野心得不到满足这点，无中生有地说党不重视科学技术，不重视知识分子。说我国科学发展速度比经济发展速度低得多，知识分子积极性发挥不出来等等。从而否定党在经济建设、安排人民生活和发展科学教育方面的巨大成绩，把党说成是“为害人民”的。另外，这种说法也是为了解脱我的反党的罪行。

因为“反党不是反人民”，那我也就无罪可讲了。这种思想和言论直到最后的集中批判中还有表露。

(2) 污蔑党不能领导新中国：62年我就说过，“中国的繁荣富强，是否一定要共产党来领导，这点我还有怀疑。”反右时我同情“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反党言论；公布了教育方针，我就拼命攻击党不能领导教育；还臆造出“发展科学要靠科学家自由的科学研究活动和自由地结成团体的集体工作”的谬论，反对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总之，党不能领导新中国，不能领导科学，不能领导教育……，我是决心彻底反对党的领导的。

从行动上，我也拼命宣扬“青年人要独立思考”，要“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听党的话’是没头脑”等，企图使青年脱离党的思想领导。至于我所组织的反动组织更是同党的领导对抗的了。

(3) 对党和领袖进行污辱和谩骂：

对党：我跟着修正主义的腔调骂党是“教条主义”，是“用过左的革命辞藻掩盖着的机会主义”。62年还拼命叫嚷“中国一定要变”，胡说什么“党内斗争很尖锐”，“反教条主义势力在增长”，有可能靠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改变党的领导等等。

对毛主席：我说“毛主席也搞个人迷信”，还说“斯大林是暴君”，“中国跟着斯大林跑”。对毛泽东思想也进行污蔑和攻击。我说：“毛泽东思想在民主革命阶段是正确的，这已为实践证明（这句话是个幌子），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就不行了。”还说：“如果它（毛泽东思想）今天错，那么可以用它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正确思想反对它今天的错误思想”，等等。

对基层组织和干部：骂基层组织“保守”，“教条”，“连显然是正确的东西都不支持”（指学习小组）。骂基层干部是“法西斯”，“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骂干部“没有头脑”，“教条”，“笨得不能再笨”等等。

(4) 公然号召同学反对党的领导：特别是在62年下半年筹办《青年论坛》时，在《发刊词》上骂党为“邪恶势力”，号召同学反对“邪恶势力”，“打下邪恶势力的气焰”等。

总起来，我和其他的反动分子一样，首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对它进行攻击、辱骂，甚至号召同学起来推翻党的领导。这充分暴露了我的反动立场，也表现了我对党的刻骨仇恨。其实，我对党的攻击和反党的活动就把我自己置于人民的敌人的地位，

置于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派的地位。我觉得，我必须充分认清这点，才能有决心把立场转过来，也才能有决心痛改前非，为人民赎回自己的罪恶。

2. 宣扬资产阶级政治观点，用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1) 攻击我国“政治上不民主”，人代会是“走形式”，选举也是“走形式”，上级要选谁就得选谁；还说有的地方连形式上的民主都没有，人们不敢批评党的政策等等。实际上，我要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因为我的根本目的是取消党的领导。在我看来，只要有党的领导，就是“不民主”；我所说的“不敢批评党的政策”也不是指善意的批评，而是想根本取消党的政策。

(2) 攻击我国“没有言论自由”，“人们屈从于‘政治压力’，不敢讲心里话”，还要求所谓“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个性”等等。这里，我所说的“言论自由”就是让反革命言论任意发表的自由，我所说的“个性解放”就是任意发展个人主义。正是因为我坚持着反动立场和个人主义，才处处感到不自由，才用所谓“争取自由”的口号去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

(3) 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攻击党的反右斗争和其他对敌斗争“不人道”，“不近人情”，为阶级敌人喊冤、鸣不平，甚至要“重新估价反右斗争”，并要为反动的父亲在“三反”时的罪行翻案。

(4) 根本否定我校政治运动和一切政治思想工作的成绩，认为它只是形成了“政治压力”，使得“人与人之间不真诚了”等等。妄图取消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工作，实现“三无政治”的局面（无政治运动，无政治学习，无政治思想工作）。但是我并不是不要一切政治，我自己就无孔不入地做了大量反动的政治思想工作。我只是不要无产阶级政治，而让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渗透到广大同学中去，为复辟资本主义，实现“和平演变”打开门户。

3. 追求修正主义，反对马列主义：

从62年底公开反修以来，我就坚定地站在修正主义的立场上，反对马列主义。其实，我支持修正主义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反右斗争时，我就跟着右派跑，说“苏共二十大是民主运动”，59年又找来南共纲领，对于“人类创造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不可逾越的”等修正主义言论很感兴趣。62年，我读了苏共新纲领。对比党的政策，对它很有好感。特别是对苏共纲领中虚伪的人道主义口号，发展科学的纲领以及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谬论很感兴趣。到62年底公开反修时，由于我的反党思想也正发展到

高峰，很自然地站在修正主义一边，反对马列主义。我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谬论。除前面提到的跟着赫鲁晓夫的调子辱骂党和毛主席之外，还说过“反修斗争是国际共运中民主派与独裁派的斗争”，“斯大林是暴君，是独裁者”，“从来反苏即反共”，“苏阿关系变坏，错误不在苏联，而在阿尔巴尼亚”等。在62—63年间，修正主义猖狂一时、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也大受鼓舞。经常收听苏联广播，对于赫鲁晓夫的话更是不加思索地相信，并百般宣扬，认为现在是“民主派占了上风”。苏共宣称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我国国内形势又很困难，用不了几年，修正主义的胜利就要成为定局，我国也“必然要变”。这时，我由于政治上的反动面貌已经暴露，采取了政治上隐蔽，努力学习业务，搞业务上的“实力政策”，盼望着我国修正主义兴起，自己好有出头之日。后来，当我国反修斗争取得了节节胜利，赫鲁晓夫又干了不少明显的蠢事，站在反动立场上的我也感到对他“失去了信心”。苏共新领导上台时，我还认为这反映了苏联的民主制度和集体领导的原则的贯彻。赫鲁晓夫“犯了错误”，就可以把他赶下去。因而。对苏共新领导仍寄予了希望。

4. 反对党领导科学、教育事业，反对教育方针：

(1) 攻击党不能领导科学、教育事业，这在前面已经提到。

(2) 反对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利用虚伪的“为科学而科学”、“为教育而教育”等资产阶级的口号，引导青年只专不红。并且广泛宣扬脱离政治的所谓“事业心”，用以抵制教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3) 反对生产劳动：从自己追求成为资产阶级的“通才”出发，认为学生参加劳动没用。攻击59—60年学生劳动太多，使学习质量大为下降等。

(4) 攻击教改运动：说教改是“严重的不实事求是”，是“根本的方向性错误”；教改“搞糟了”，“毁灭了科学”，“毁灭了理论”，教改是“第二次焚书坑儒”等等。

我之所以根本反对教育方针是有着深刻的根源的。我从小就形成了个人主义成名成家的思想，这种思想越发展越严重，到了58年，已经发展到一意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非成名成家不可了。教育方针公布了，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要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与我想使自己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万能科学家”，实在是水火不相容的。我的这种个人主义思想在最近六、七年里不但没有去掉，没有接受党的教育，改造自己的思想，相反地，却坚持不放，还有了

更进一步的发展。因而我把教育方针看成是阻碍，把党的领导看成是绊脚石，为了实现个人主义的野心，我竟不惜反党、反人民，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起劲地反对教育方针的原因。

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我由于反动思想和个人野心的发展，在61年底，开始了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下面我简单总结一下我的反党活动。

1. 所谓“争取群众”的活动：这是在61年底开始的。我当时说，“为了我的事业，我必须争取群众”，“有了群众，就有了良好的开展活动的环境，也就有了我的事业”，“我要把自己所认识的真理也告诉群众”，“要争取群众”、“教育群众”等等。

什么是我的事业呢？其实，说穿了，就是反党、反人民的“事业”。我的计划是，从政治上，先从宣传反动思想入手，时机成熟时创办刊物，用宣传来达到“团结群众”起来反党的目的，最终实现推翻党的领导，兴起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野心；另外，组织学术团体，占领科学阵地，排挤党的领导，而自己成为科学事业的领导者兼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等。

请看我“争取群众”的活动：

(1) 进行调查分析，摸清情况：先进行了解工作，掌握同学的政治思想情况和各方面的情况，然后把班上同学分成几类，决定自己的依靠、团结、争取、打击对象。

(2) 抓住弱点，发动进攻：利用同学的弱点，先突破一点。比如有些同学重专轻红，我就大谈学习方法，理想抱负；有人政治上有错误看法，我就对他表示支持、同情，继而散布更多的反动思想；有人生活上有些缺点，我就拉他下馆子、喝酒、抽烟等。

(3) 吹捧自己，骗取信任：吹捧自己有才能，学习上工作上都有办法等，使同学盲目崇拜；又把自己装扮成为人民、为祖国、为真理奋斗的斗士，使同学盲目敬仰；这样骗取同学的信任，达到同学相信我的话，爱听我的话，愿意替我办事的目的。

(4) 利用时机，大肆放毒：当同学愿意和我接近了，就利用时机，大肆放毒。往往先讲青年人应该“独立思考”，要“反对盲从”，使其不相信党的话，解除了思想武装；然后才散布各种各样的反动观点。这也要因人而异，投其所好。

(5) 生拉硬骗，参加组织：把一部分自己认为是依靠对象的拉入我所组织的反动

组织，如学习小组，“青年论坛”等，使其成为自己活动的工具。

我“争取群众”的活动，由校内到校外，学生到老师，甚至中学生、工人、农民都无所不及。这是我反党、反人民的主要活动，也是我对人民犯下的最大罪恶的活动。因为我的这种活动，影响了很多，使他们不同程度地脱离了党的领导，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也有人受的影响深些，严重阻碍了他们的进步。我今天感到特别对不起这些人，感到自己是有罪于人民，有罪于这些受我蒙骗的群众的。另外，我的这种活动也正是当前阶级斗争的突出表现之一。资产阶级不能用暴力反对无产阶级统治，他们主要的斗争形式就是“和平演变”，就是与党争夺青年一代，而我就参与了这种罪恶活动，向无产阶级发动了进攻，也拼命用自己的反动影响去毒害我周围的青年同学。

此外，今天冷静地想一想，我的这种活动怎么可能成功呢？我出于反动阶级的偏见，过低地估计了群众的觉悟，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虽然一时迷惑了几个“群众”，但终究是蚍蜉撼树，遭到了可耻的下场。这因为我的活动是同历史潮流相对立的，是违反历史规律的，那就不管使尽了多少花招，也难免失败的命运。我觉得，我必须认清历史的方向，认清当前的形势，坚决地把立场转过来，才可能有所作为，否则将会遭到更加惨重的失败，以至于最终博得自己的粉身碎骨。

2. 组织学习小组（62.2.--63.1.）：这是组织反动组织的第一步，是个别“争取群众”活动的进一步发展。这个小组无论从主观目的上还是客观效果上都只有两方面坏的作用：其一，从业务上拉拢同学，作为我搞学术团体的准备，此外，还有“物色人才”、“锻炼工作能力”的作用，还通过小组活动，向组员灌输只专不红的坏影响，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引诱同学；其二，是我“争取群众”，进行反动宣传的阵地。在小组活动内外，我利用个别交谈、集体讨论，散布了大量反动言论，进一步进行了“争取群众”的罪恶活动。在小组存在的短短一年间，我先后发展了十个组员，组织了大小报告会、讨论会三十多次，还有不少活动邀请了组外同学参加。曾经参加过小组活动者，不下二十人。由此可见，它在班内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多么深广，对班内同学特别是小组成员的毒害有多么大！我应该牢牢记住自己在这里给人民欠下的债，今后一定要努力改造自己，为人民做出一些有益的工作，来回答党和人民对自己的宽大。

3. 筹办《青年论坛》：这个刊物是学习小组从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62年暑假，

我认为自己“争取群众”活动已经“有了成绩”，同学们思想“很活跃”，可以进一步创办反动刊物了。于是自己狂妄地喊出要“提倡思想解放运动”，“办一个刊物”，“用它点燃起新运动之火，使其烧遍全国”等。于是从62.9.开始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1) 准备工作：1) 在同学们中间叫嚷“反对盲从”，“独立思考”等口号，解除同学的思想武装，使他们先去怀疑党，不听党的话。2) 强调“自由争论”，以吸引群众，并为反动言论发表打开门户。3) 美化这个刊物，说它是“青年自我教育的工具”，以争取更多的群众。以上是群众条件的准备。4) 纠集了一批编委，从国庆休假期间在颐和园开会决定办刊物以后，多次开会，做了细致的安排和部署。这是组织上的准备。5) 此外，我还写了反动的《发刊词》和一些准备在《论坛》上发表的文章。在《发刊词》上，我公然号召同学反对党的领导，“打下邪恶势力的气焰”，对党进行了各种公开的和隐讳的辱骂和攻击。

(2) 筹办过程中与党团组织讲斗争策略，展开了一系列尖锐的阶级斗争。当时有的同志提出要与团支部合办，我考虑到这不会威胁到我的目的，同时还可以争取到一部分进步群众时，就答应合办。但后来感到组织上的意图与自己有矛盾，而再想单独办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否则会失掉群众甚至编委的支持），于是对组织采取了斗争策略，玩弄起所谓“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花招，要争取“独立性”，实质是拒绝党的领导。直到这一招也失败了，才怨气冲天地放弃了自己的企图。

这个《青年论坛》最终是没有办成，但是它说明了我的反动思想已经走到了多么远。我已经想在全国煽风点火，企图从根本上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和个人的政治野心了。这个刊物虽然没有办成，但仍然是对党、对人民的重大罪行。这不光是从目的看，而且从我对党团组织进行的一系列斗争看，都是向无产阶级的一次最猖狂的进攻。

4. 结交反革命分子林××、彭××及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陈××：我由于自己坚持反动立场，拼命寻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伙。62年初与陈××开始接触后，不久就无话不谈，成了知心朋友。62年底又接近了林××，关系马上就十分亲密了。与彭××的交往更早，由于同宿舍，一直比较密切。我在与他们的交往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1) 共同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和他们在一起谈反动言论是可以“畅所

欲言”的，因为彼此的立场都很反动，谁也不用害怕谁。我们在一起攻击过党；攻击过三面红旗，特别是大跃进；攻击过社会主义的现实，把它说成漆黑一团。还追求、向往修正主义，讨论过国内形势，共同盼望党早些垮台，盼望我国也兴起修正主义等等。这些谈话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2) 共同密谋反党活动：我把自己“争取群众”的计划毫不掩饰地全交给了他们，和他们一起讨论。比如在筹办青年论坛时就曾多次与陈、林商议，他们劝我“要用新的名词写旧的内容”，责备我“旧的口号喊得太响”，在学习小组和《青年论坛》失败后，我也曾在他们面前发泄对组织的不满，攻击和辱骂干部，并表示进一步向他们靠拢。

(3) 63年初，我和他们的关系更为密切。当时，怀疑林有反革命组织。我竟然用诱骗方法想探听他的组织，甚至自己也想参加，与他们同流合污。我还多次向他们表示想投靠修正主义，问他们有没有海外关系。甚至想偷越国境、投敌叛国。这时，我的立场已经极端反动，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成为林的反革命组织中的一员，彻底堕落为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

以上简单叙述了我的主要反动思想、言论和反动活动及其发展过程。

(空一行)

63年8月林、彭相继被捕，陈也被勒令退学以后，我个人的反动活动遭到了彻底失败。国际国内形势都一天天好转，我所向往的修正主义也日暮途穷走下坡路。这种形势对我是极端不利的，使我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而这时，组织上又反复教育我，要我痛下决心、改造思想，不少党和行政的领导同志耐心地同我谈话，启发我、鼓励我，也给我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种形势下，我才交代了一些问题，有些悔改的愿望。但是由于我没有抛弃反动立场（甚至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是立场问题），只是纠缠在一些认识问题上，因此我始终没向人民低头认罪，改造的一点愿望不久也消失了，仍然坚持跟党对立的立场。

64年2月份，由于我认为自己的改造“已经得到组织上的承认”，便放松了对问题的检查，而用大部分时间于文学。当时觉得在数学上成不了名了，对数学又失掉了兴趣，于是梦想当文学家，梦想几年后就能写出有水平的作品来。同时，还由于思想上波动比较大，自己觉得有发泄自己情感的要求，想写些东西（我一直爱好），想以自己“思想改造”为素材，写一部“革命的作品”。此外，由于我事实上坚持反动立

场，对于当时出现的“话剧革命”很反感，觉得它们简单化、概念化，而自己想用刻画“复杂性格”的作品与它们相抗衡。就在以上这种种思想的支配下，我才加紧了文学学习，并坚持了半年之久。

64年暑假，特别是64年9月麦××被开除以后，我思想震动很大。因为我意识到组织上并没有相信我的“思想改造”，相反地，却向我敲起了警钟。于是我采取了对策。我规定了从那时到毕业的“总方针”是“争取毕业”，一方面伪装思想改造，写了不少思想汇报，其中有些就是对组织的欺骗；另一方面，也做了各种准备。特别是准备在毕业时批判会上与党团组织辩论，一口咬定我是在“思想改造”，而组织不相信我，甚至想闹到团中央。

这一段时间里我的真实思想还是很反动的。我曾经打算，将来无论到哪，都伪装进步，争取入党，甚至想一直往上爬，爬到领导地位，来实现我复辟资本主义的梦想。我也曾打算，将来还要坚持文学学习和写作，用文艺“指出时代发展的方向”，其实是想宣传修正主义。这些打算虽然只停留在思想上，但说明了我的反动立场并没有根本改变。

65年3月底到4月初，全校毕业生对我进行了一周的集中批判。党组织把我的问题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本着批评——团结——批评的原则，摆事实、讲道理地同我辩论。在这次批判中，我的思想才有些变化，初步认识了我的问题是立场问题，由于我长期拒绝思想改造，反动立场已十分顽固。与之适应的，还形成了一套唯我主义的世界观，对很多问题我不是认识不清，而是为了维护反动阶级的利益，硬不去认识，也不敢认识；我还初步认识了党和人民是一致的，党是代表了真理的，我反党就是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恶，因而我表示了低头认罪，并决心彻底悔改、重新做人；对于今天的形势和群众觉悟我也有了些认识，知道了自己走的是与历史发展方向相反的道路，是一条死路；也知道了党是无比坚强的，群众也是坚决与党站在一起的，我已经处于人民的敌人的地位，因而决心抛掉反动阶级的立场，站到95%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来，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后，我还挖掘了三大根源：家庭及社会影响，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拒绝思想改造。对于我在批判中态度的这些转变，党组织又做了充分的肯定，这给我极大的鼓舞。我有决心，从今以后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坚持思想改造，并且在工作中踏踏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争取早日回到人民中来。当然，这只是决心，还要靠今后的行动来验证。

4.15 写毕

以上就是我的《个人总结》全文（一字未改），它至今还保留在我的档案里。相信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的自白，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大学生的思想总结。事实上，这个“总结”反映的正是最后一周对我大会批判的定调，从中读者可以领略上纲上线的威力，相信也能辨别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被迫招认的。

1980年，在北大数力系给我平反时，我曾对党总支部书记林建祥说，像这样的《个人总结》和组织鉴定中的“该生有系统的反动思想，在学期间有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活动”这第一句话，如果我想调工作，拟调去的单位领导敢要吗？即使要了，会怎么使用呢？再来运动，要不要先整我这样的人呢？林回答：“组织上对你是了解的，知道哪些是不实之词，对你不会有影响的。”又说：“你还调什么工作呀？难道北大不好吗？”（其时我已通过考研究生，又提前一年毕业留在北大任教。）我无言以对。其实，所谓的“平反”只是撤销了开除团籍的处分，并顺便表示大学毕业时对我的批判是错误的。我写的检查和其他有关材料（如日记、私人书信等），都没有退还，也没有当着我的面销毁，只说这些材料都找不到了。后来，直到退休，我曾四次追讨这些材料，给的答复都是“档案里没有你要的材料”。

九、黯然离校

补叙一件大事，大概在4月12日左右，年级负责人公布了我们年级的毕业分配方案，这是同学们盼望已久的。这次会议也通知我参加，这就是说，我终于能毕业了，而且和大家一起分配工作了。根据宣读的毕业分配方案，数学专业100名左右同学，只有30名左右分配到高等学校、研究所以及部队保密单位，另外70名左右都分配到“×省市教育厅”，这些人将来会再次分配到中学任教。这70人分配到的地区只有上海、北京、河北三地。记得大概是上海40人，北京17人，河北13人。最后读的是分配到河北省教育厅的13人，最后一名是我。尽管分配到中学的同学多数都不高兴，因为文革前的历届北大数学系毕业生几乎没有到中学的。但我的心情和别人很不一样，我感到很兴奋。因为终于“思想改造”有了结果，没有被送到劳改或劳教场所，而是和别人一样作为毕业生分配了工作，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而且，同学们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原来不敢和我说话的现在也主动和我搭讪，特别是分配到河北的同学。我们选定4月下旬的一天一起去天津报到（那时河北省会在天津），从此将开始新的生活。我们到天津后，一名身体有残疾的同学被留在天津，其余分别被分配到石家庄、

廊坊和唐山。我是被分配到唐山的四个人之一。从此以后，我就在唐山工作了13年半，直到1978年10月又回到北大读研究生。而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在结束本文时，我想对几件事做个说明，同时也谈谈我的几点感想。

第一，对于前面提到的“处理反动学生”运动，可见王学泰的《文革前的清理“反动学生”事件》一文（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4期）。这个运动的根据是1963年7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毛泽东的批示是“这类现象所在多有，这是一批极右分子。”该文件说“据北京市反映，今年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又说“北京市的高等院校有这样的情况，全国高等院校也必然同样有这种情况。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教育部经国务院文教办批准制定了《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在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期间的试行管理办法》。第一个被处理的反动学生是北京地质学院物理勘探专业的尚育森（1963年），北京高校毕业生做政治鉴定的事也始于1963年。1964-65年北京市高校又处理了100名左右的反动学生，1966年文革后此事“无疾而终”。前后在南口农场劳改的反动学生据王学泰上述文章说共有61人，根据平乃彬《南口北京高校劳改营纪实（2010修改版）》有60人，另有2人在其他部门劳改。平乃彬文原载新浪博客，现已被删除，缩写版《南口北京高校劳改营纪实》载《炎黄春秋》2011年06期。我年级最后批斗的张××就是在南口农场劳改的一员。我则侥幸逃避了。

第二，数一班的一位数学学得最好的同学麦××在1964年10月借口“与同学打架，属流氓行为”开除学籍，真实原因是“思想反动”。

第三，用压服和恐吓的办法进行思想改造是不可能的。拿我来说，被批判时间最长，组织上下力气最大，而且我个人出于追求真理的天性，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改造思想的愿望”，可是今天看来，改造成功了吗？没有！过去认为是对的，现在还认为对；过去认为错的，现在还认为错，思想几乎没有改变。要让人改变思想，必须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压人，否则是没有作用的。

第四，从“困难时期”和同学们的接触感受到，追求自由确是人的天性，而且思想自由也是无法控制的。你可以用强权不让他说，但你无法不让他想。政治上稍微一

放松，思想就有要求表达出来的冲动。像在“知识分子小阳春天气”的那两年，过去不敢说的都要说出来。我们班同学是怎样，全国也是怎样。只要读读《燕山夜话》，作者批评大跃进时期的所作所为是何等犀利，不要忘记它的作者可是党的高级干部呀！

第五，在大学的五年半生活中，我感到最痛苦的事是什么？不是挨批时的恐惧，不是筑路劳动时高强度的折磨，也不是“困难时期”挥之不去的饥饿感，而是自己内心的思想斗争。诚然，挨批判时内心是十分恐惧的，毕竟我只是个没有生活阅历的青年，初次挨批，不会有挨批多次的老运动员世事洞明的坦然。而且，又不知道将来怎样对我处理，要说不害怕那是骗人的。筑路劳动又苦又累，粮食又不够，也不能说不是是一种折磨。但是，它们和思想斗争比较起来，就都算不了什么。因为思想斗争是自己心灵之中的斗争，内心里总有两种不同且对立的思想，孰对孰错，何去何从，总思量个不停，无力摆脱。这就使内心一刻不得安宁，从而感到痛苦不堪。如今我活到近八十岁，通常人们所说的痛苦我也经历了不少。比如在文革中挨批斗，坐“喷气式”，体罚挨打，住“黑帮队”，我感到的是皮肉受苦，精神上并不十分痛苦。对于“革命小将”的污辱，骂我是“阶级敌人”，“牛鬼蛇神”，甚至从楼上往我头顶上吐痰，我也能逆来顺受，想他们只不过是孩子，心中并不十分记恨。这是指政治方面的。疾病带来的痛苦是长达六十年的失眠，每天要靠几种不同的安眠药来维持睡眠，但自认天生是多思少眠人，也就认命。这些痛苦加在一起也抵不上大学时代的思想斗争，那是刻骨铭心、触及灵魂的痛苦。📖

2019年4月第一稿

2019年10月修改

写在《我的大学》完稿之后


毕业离校以后，我被分配到河北省唐山市第五中学工作。文革前曾教了一年初中的平面几何。和全国大多数单位一样，1966年6月初，五中也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经历了成立文革小组（代替大单位的派工作组），整“牛鬼蛇神”，公布十六条，文革小组解散，革命大串联，成立战斗队，革命大批判，斗批改，群众组织分裂、武斗，再到革命大联合的曲折过程。终于在1968年五六月间成立了“五中革委会”，作为新的政权机关代替了五中党支部，行使学校的一切权力。

在我的记忆中，革委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阶级队伍”，于1968年7月建立了“黑帮队”，强迫“有问题”的师生加入“黑帮队”进行隔离审查。计有男女两队，分居在大小两个教室。我是在1968年8月22日进的“黑帮队”，原因是北大的问题要重新审查。每个“黑帮”都要在胸前戴一白布黑字牌，上面写着你在“黑帮队”的身份，不准摘掉。我的牌上写的是“反动学生、漏网大右派”。

我在“黑帮队”待了近一年，于1969年7月1日被“解放”。“黑帮队”里也有很多故事，拟另文叙述。这里只谈在“黑帮队”里继续检查、批判在北大的问题的大概情形。

在五中“黑帮队”里，“黑帮”的主要任务是劳动，晚上还要开“黑帮”互批的会，很少有个人写检查的时间。记得工宣队1968年10月进校以前，“革命小将”热衷于对我们的批斗，没有写过系统的检查。工宣队进校后，安排过一次全体“黑帮”的停工写检查，目的是了解“黑帮”们的政治问题。时间在10月底到11月中。写完后要在全体“黑帮”会上宣读，大家（包括工宣队员）提问题、意见并批判。不过关的要重写或添加补充材料。我写了一份长达20页的交代材料上交，自己保留有4页的提纲。后来又让我写了一份与我班被捕的两个同学关系的补充材料，有4页，也保留了下来。以后就再没找我。

但到了1969年5月，工宣队再次找我写系统交代材料，并告诉我这是为我的问题定案用的，要存档。我知道这意味着要被“解放”了，当然写得很认真。我写了29页的检查，后按要求又写了两个补充材料和一份《对问题的认识》。三份检查都留了底稿，《对问题的认识》留了提纲。这些材料附在下面的“资料”里，供大家参考。

1969年7月1日革委会宣布解除了对我的审查，并公布了唐山五中革委会的《徐明曜的综合材料》及唐山齿轮厂驻五中工宣队的批示，张贴在五中院墙上。我抄录了下来，也附在下面的资料里。文革后，北大对我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平反，有关材料也附在下面。特此说明。 

2019年11月25日

【资料】

首先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最高指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系统交代材料**一、个人简历**

1941年9月生于天津市。

1947年9月——1953年7月：北京锦什坊街第一小学读书。

1953年9月——1954年7月：北京四十二中初一。

1954年9月——1956年7月：集体转学至北京三十八中，初中毕业。

1956年9月——1959年5月：北京四中高中肄业（1958年9月——1959年5月因病休学，1959年5月退学）。

1959年9月——1965年4月：北京大学数力系读书。

1965年4月——1965年7月：待分配，曾参加唐山市园林处建筑工程队义务劳动，共两个月。

1965年8月——现在：唐山五中工作。

二、家庭和社会关系**（一）家庭成员：**

父 徐光烈：辽宁省新民县人，据他说是中农出身，1935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后在伪中央银行天津分行及北京分行做职员。1942年到44年曾中断了三年，到徐州做买卖，和几个朋友开办“徐州宝来贸易公司”，他担任该公司经理。解放以后留用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做职员。三五反运动中，因查出他在解放初期曾经参加“聚餐会”，泄露国家经济情报，被判处机关管制二年，并调到内蒙古自治区（当时的绥远省）陕坝镇人民银行工作。后因病辞职（1954年）回京。1963年被安插在北京天堂河农场工作，任五分场会计。文化革命后，该厂被宣布为“强劳农场”，他被宣布为“强劳人

员”。1968年11月，他被定为人民内部矛盾，摘掉“强劳”帽子，成为该厂职工。该厂改名为北京104-1农场。

母 周××：56岁，家庭妇女。

兄 徐××：内蒙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人民银行职员。

姐 徐××：北京马甸中学职员。

弟 徐××：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工人。

（以上四人均无问题。）

妻 杨××：上海市南海中学教员。据来信讲，在文化革命清队工作中曾受到审查，1968年11月——1969年1月参加该校的火线学习班，1月中旬即得到解放。

（二）社会关系：

大姑 徐××，姑父 何××：住沈阳市皇姑区东华山路二段永大里4号。何做搬运工，未听说有什么政历问题。

二姑 徐××，哈尔滨第二工具厂工人。二姑父 谭××：哈尔滨第二工具厂供销科长。均未听说有什么政治问题。

姨 周××（母亲的堂妹），宁夏药品检验所工作，无问题。

嫂 王××，北京南梨园中学教员，无问题。

姐夫 平×，工作单位不详。

妻弟 杨××，北京眼镜一厂工人。

（三）对家庭的认识：

1. 我的家庭是万恶的剥削家庭：

从我父亲的情况看，我的家庭出身是职员或高级职员。但职员这个阶层是比较复杂的。通过对我们家庭的经济状况的具体分析，我认识到我的家庭是个万恶的剥削家庭。

首先，我父亲从国民党中央银行领取的薪金是很高的，这是四大家族搜刮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果。我父亲做了四大家族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

其次，1942——1944年在徐州宝来公司期间，直接充当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参与了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活动。

第三，从我们家庭经济状况看，解放前很富裕。自己有房十余间，雇着保姆，比一般劳动人民生活不知高出多少倍。这更说明了我们家是剥削家庭。

2. 家庭对我的反动影响：

我的家庭一方面是个剥削阶级家庭，另一方面又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对我的反动影响也是多方面的。这是我犯罪的阶级根源。

首先，我自小生长在剥削家庭里，和广大劳动人民隔绝，和劳动隔绝，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而沾染了一身剥削阶级思想。如轻视体力劳动，好虚荣，自视高人一等，成名成家等。这些坏思想在我反动思想的发展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的这些思想一方面是由自己所处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父亲对我的教育分不开的。

我父亲作为剥削阶级营垒中的一员，同时又作为一个受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较突出的是：经常不断地向我灌输个人主义成名成家和个人奋斗的思想。也用他自己的经历，物质引诱和精神鼓励等各种方法对我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具体实例从略。

三、我在大学阶段所犯的严重罪行

我在大学学习期间，由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拒绝思想改造，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而接受资产阶级和苏修的反动思想，使自己的反动思想恶性发展起来，从1959年到1963年，犯了一系列极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主要罪恶事实系统交代如下：

（一）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

1. 1959年反右倾学习时，借向党交心，放了大量的毒：（1）攻击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胡说我们街道炼钢一两也没炼出来。（2）用报纸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语言攻击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3）攻击大跃进有浮夸现象，放高产卫星不实事求是，学校中体育大跃进不少都不符合标准。

由于以上言论，在1959年12月受到全班同学的重点批判。1961年被陆平黑帮借甄别工作名义平了反。我认为对我的批判是应当的，平分是错误的。

2. 在困难时期，1962——63年初，又借困难时期攻击党的三面红旗。主要言论：

（1）总路线强调政治挂帅，认为政治决定一切，是唯心主义，唯意志论。（这是搬弄苏修的所谓“理论”来攻击总路线）；

（2）三面红旗搞糟了，暂时困难是由党的工作中的错误造成的；

(3) 三面红旗已经不存在了，“大跃进没有了，人民公社剩下个空架子，除此之外，总路线还有什么呢？”

(4) 1963年初，我国经济好转。我由于害怕会处理我的政治问题，说经济好转不是好事，而是坏事。

(二) 支持苏修，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我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4月间，立场完全倒向苏修。当时正是中苏开始公开论战之时。我支持了苏修，反对伟大的中共的马列主义路线，反对了毛泽东思想。由于立场完全站错了，我对于苏修的言论简直是不假思索地赞同，并加以宣扬，犯了极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我的主要言论是：

1. 认为修正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当时出于反动立场，把修正主义说成是“共产主义”。）
2. 吹捧《苏共纲领》是“时代的真理”，“是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吹捧苏修头子赫鲁晓夫“创造性发展了马列主义”。
3. 按照赫鲁晓夫的调子攻击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斯大林，说斯大林搞个人迷信，是个“暴君”。
4. 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犯了路线错误、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重复一个同学（施××）的话说，“从来反苏即反共”，攻击中共背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5. 宣扬苏修及刘修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我当时搬弄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胡说什么“阶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就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并说苏联阶级已经消灭，中国剥削阶级还只剩下残余。

从这点出发，我对于苏修宣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口号很感兴趣，并为之宣扬。什么“建立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的社会”，什么“人与人之间是同志、朋友和兄弟”，什么“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等等，我都把它们奉为圣经，并且加上自己的话加以宣传。我胡说“马列主义基本精神贯穿着人道主义”，“革命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一个马列主义者，一个革命者，首先是一个社会上正常生活的人”等等，当苏修叛徒集团的吹鼓手。

也是从这点出发，我对苏修宣扬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谬论也很欣赏，并为之吹捧。胡说什么“苏联阶级已经消灭了，党和国家性质就要改变，无产阶级专政也要过

渡到全面专政。”并胡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国家理论的新发展。

6. 苏阿关系破裂后，毫无根据地攻击阿尔巴尼亚，说“苏阿关系的破裂责任不在苏联，而在阿尔巴尼亚。”

7. 读了《南共纲领草案》后（这是反革命分子彭××向我推荐的），宣扬它里面的一句修正主义言论：“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不是不可逾越的”。并且说，铁托集团说这样的话“很有勇气”。

8. 在广播苏共中央公开信时，曾说广播员用这种腔调我听不下去。还说“中苏矛盾一个巴掌拍不响，两边都有错误”。（这时对苏修看法有动摇，但立场仍未转变。）

9. 1963年初，由于狂热追求苏修的反动立场，写了一首黑诗《向北方》，把苏修称为“北方的红星”，“人间的天堂”。并有“我愿意来到这人间的天堂，哪怕是在那美妙的梦乡”的肉麻的诗句。在1963年初，还收听过6—7次苏修广播。

10. 直接反对毛泽东思想，（在检查会上说）“在民主革命阶段，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这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但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思想犯了错误，过份强调了阶级斗争。”

（三）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运动

我出于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又受到国内右派分子和国际上苏修的影响，1962年到63年初疯狂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犯下了一系列极端严重的三反罪行。主要言论如下：

1. 直接反对党的领导，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样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还和一个同学说过：“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切工作都要由党来领导？”我心目中追求的是修正主义的即资产阶级的领导。

2. 追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主要言论：“我国政治不民主，人大是走形式”，“尤其是言论不自由”，“我班同学多数不敢讲心里话，会上和会下说的话不一致。”还说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只是形式，但是只有形式上的民主也比连民主的形式都没有要好！”

3. 疯狂为右派翻案：1962年底，叫嚷要“重新估价反右斗争”，并借来右派言论集和反右斗争文件，说“要用一定时间看看这些文件，了解反右斗争到底是怎么回事”，企图为右派翻案。我这样做，虽然不能真正为右派翻案，但吸收了大量

的右派思想和言论，自己中了很深的毒。同时也在群众中进行了一定的散布。

4. 反对政治运动，认为“政治运动就是为了整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59年批判系内右派分子程庆民，我感到有些做法“过份”，“不人道”。自己甚至于提出要实现一种“无政治学习，无政治思想工作，无政治运动”的所谓“三无政治”的局面。

（四）反对党领导科学事业，反对党的教育方针

我一方面由于反动立场，另一方面由于严重的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思想，追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套，自上大学以后，疯狂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攻击党的教育方针，反对党领导科学教育事业，散布了大量的反动言论。主要的有：

1. 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认为“知识分子强调思想改造过多会影响工作，影响科研”，“党不重视知识分子”，认为党的领导“限制了知识分子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 反对党领导科学事业，胡说什么“科学的发展要靠科学家的自由的科学研究活动和科学家自由结成团体的集体工作”，“科学和计划发展是矛盾的”。甚至说“党和科学是矛盾的”。污蔑我国科学发展太慢，胡说“我国解放后没有出现真正有贡献的科学家。”还说“双百方针在我国并未真正落实。”

3. 反对党的教育方针：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劳动太多影响学习”，反对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攻击1958—59年的教育革命，认为“教育革命无成绩”。尤其攻击教学改革运动，说教改“让学生编书是胡闹”，是“第二次焚书坑儒”。

进一步攻击党对“进步”文化遗产态度不慎重。说“有人要创建无产阶级的数学，要砸烂‘牛家店’，火烧‘哥家楼’，这是列宁早已批驳了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主张”。我还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与人类创造出来的文明财富是不矛盾的。”影射攻击党背叛共产主义。

（五）反动活动方面

我在1962年到63年初，出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和个人主义目的，搞了一系列反对活动，给党的教育事业造成极大损失，对党，对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 “争取群众”的罪恶活动：

我一直注意群众关系，认为“搞好群众关系”是搞个人事业即反动活动的基础。我在日记上写过：“为了寻找事业上的伴侣，必须争取群众，搞好群众关系。”（不一定是原话。）这是我“争取群众”的原始思想。“争取群众”的活动是与我其他反动活动交织进行的。

具体做法：1962年全年，我几乎每周都找同学谈话两三次。通过谈话、交朋友、散步、下饭馆等各种方式，针对同学的不同思想情况，进行反动的政治思想工作。甚至于我还把班上的同学分类排队，决定哪几个人自己可以依靠，交成知心朋友；哪些人可以团结，交成一般朋友；哪些人不能与之接近。当时和我关系密切的同学有张××、陈××、杨××、温××等。

在与同学谈话中使用的手法：

（1）打着“交朋友”的幌子，宣扬“人与人是同志、朋友和兄弟”的修正主义口号。用“友谊”来迷惑人，拉拢人。标榜自己待人“开诚布公，真诚相见”，“以心换心”来迷惑、拉拢一部分落后群众。

（2）打着“集体主义”招牌。我说过，“二十世纪的科学发展须靠集体工作”，“学生时代要交几个事业上的朋友”等迷惑人，拉拢人。

（3）针对同学的不同特点，投其所好，骗取好感，来争取群众。

如同学中的大部分对业务学习很重视，我常与同学谈学习，谈学习方法，谈所谓“理想、抱负”。谈所谓“对数学发展的具体问题的见解”，高谈阔论，夸夸其谈，来拉拢同学。

有些同学政治思想上有些问题，我用所谓“真诚相待”，“以心换心”来谈自己的反动思想，引导他们更加反动。

有些同学好吃喝，我也与他们一起下饭馆，抽烟、喝酒交成“酒肉朋友”。

（4）打着“思想改造”的招牌，与同学谈自己的思想问题，使得他们中了我的毒。“争取群众”是我当时使用的反动语言。

它的反动效果：

（1）实质：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罪恶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用“和平演变”的形式进行的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

（2）我确实拉拢了一部分人参加了我的反动活动，如“学习小组”、“青年论坛”等，使他们的政治成长走了弯路。我对他们犯了罪。

(3) 在与同学谈话中，我散布了大量反动的以及错误的言论，把我自己的反动立场和世界观极其充分地暴露出来，对同学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

简单的批判（提纲）：

自己作为青年学生是资产阶级和党的争夺对象。但我很快被争夺过去，又代表资产阶级和党争夺青年同学。这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

我的所谓“三无政治”的虚伪性，我自己就无孔不入地进行反动的思想政治工作。

2. 组织“学习小组”：1962年3月—62年11月，约一年。

目的：其一，个人主义成名成家目的。想为将来组织团体做准备，物色事业上的伴侣，同时也希望在这里出些“成果”。其二，政治目的。出于反对教改、反对党领导科学事业的想法，想搞小组和1958—59年普遍组织的学习小组相抗衡。由于这个目的，我没有向党组织汇报这个事情。

过程：1962年3月正式成立。共5人：陈××、张××、丁××、赵××和我。成立时，我草拟了《公约》，每个组员在公约上签字。1962年9月发展到10人，赵××退出，又加入李××、于××、马××、杨××、温××、李××。

活动内容：每周1—2次（后期改为每周1次）“专题讨论会”，内容是数学，还有不定期的“读书报告会”、“学习经验交流会”等，内容也都是数学。

危害性及简单的批判（提纲）：

(1) 是为刘修教育路线出了力，效了劳，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的一个部分。

(2) 组内组外散布了大量反动思想，在政治上给党的教育事业带来极严重的损失。

3. 筹备反动壁报《青年论坛》：1962年10月。

1962年10月。我出于反动思想和个人野心的恶性发展，纠集一伙人，想办一个刊物《青年论坛》，并进行了一定的筹备工作。后来，由于组织及时发现而制止了。这是我的一个很严重的罪行，同时它也反映了不少反动思想。

目的：当时的原始思想是想办个刊物，来自由讨论青年人感兴趣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政治、生活、学习等各个方面，来探索出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甚至想办油印刊物和铅印刊物，这可见野心之大。

从我当时的立场、思想来分析，这个刊物是有极反动的政治目的的。我当时反对党的领导，认为它是束缚青年思想的所谓“传统观念”，提出“反对盲从”，“思想解放”。在这个刊物上，就是要把矛头指向“传统观念”，即党的领导。同时我也极

自觉地想在这个刊物上散布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我狂叫“要教育青年”，“自己认识了真理也要让全体青年懂得”，这虽然是极狂妄的叫嚣，但也反映了资产阶级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的狂妄野心。

过程：1962年国庆节，我找张××、陈××去颐和园商量办刊物的计划，决定先办壁报，组织一个编辑委员会，并商量的编委的人选。国庆后，组织了编委会。参加者有陈××、张××、杨××、温××、王×、陈××、彭××等。由于张××提出要向党组织汇报，团支部李××提出这个刊物由团支部领导，和团支部合办。我坚持反动立场，不愿意这样做，展开了一场斗争。我召集几个骨干编委商量，说“要接受团支部的思想领导，但在组织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实际上是拒绝接受党的领导。后来由于我周围的编委们的分化（陈××、彭××等自动退出，张××、陈××等向组织靠拢），我个人孤立，该刊筹备工作归于失败。

主要罪行：在筹备过程中，纠集一伙人，向他们散布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甚至一度造成全班同学的思想混乱；在决定和团支部合办后，又要弄花招，和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并写了极其反动的发刊词。由于我的这些活动，受到了阶级敌人的重视，彭××直接参加了编委会就是明证。具体罪恶如下：

（1）打出“自由讨论”的资产阶级口号：发刊词中写“这是青年人自己办的，为我们大家自由发表议论的讲坛”，与同学谈话中也号召青年“讲心里话”，影射攻击我国“没有言论自由”，为反动思想的自由泛滥提供场所。

（2）公开煽动青年反党、反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领导是“束缚青年成长的传统观念”，号召“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并提出所谓“提倡理性，反对盲从”的反动口号。攻击党是“邪恶势力”，号召“打下邪恶势力的气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

（3）歪曲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叫嚣“反教条主义”：发刊词中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号召我们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这给了我们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号召青年在党的思想原则下，团结起来，同教条主义和卑劣的左倾之风作不调和的斗争”。

（4）宣扬抽象的“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大谈“只要追求真理，就一定能找到真理”的反动谬论，号召青年“不要怕接触毒草，接触错误的东西”，为宣传反动思想打开门户。

简单的认识（提纲）：

毛主席说：“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搞的《青年论坛》就是为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的。

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邓拓的反动言论出在这个时候，各个文化领域都出现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逆流。

4. 与反革命分子林××、彭××，思想反动的学生陈××的关系

林××、彭××均系我的同班同学，林自1962年9月与我同班，彭从1959年入学时即在一班。我与彭接触少，主要是和林××的接触。陈自1962年2月与我同班，和他的接触最多。

我与林、彭、陈接触的主要内容是互相散布反动言论。由于思想一致，我在前面交代的主要问题都在他们面前直截了当地谈过。在谈话当中，他们的反动思想也反过来影响我，使自己立场日趋反动。另外，在1962年11月以前，与他们的接触还较少，而在1962年11月以后，当时我搞的《青年论坛》受到党组织的批评，“学习小组”也只剩下空架子，一般同学不愿和我接近，我感到孤立。由于反动立场，就自动地向林、彭、陈靠拢。

下面交代与林、彭之间的一些具体事情：

（1）1962年11月受团内批评后，我找林、彭谈话（地点：二体地下室），发泄对党的不满。我说：“《青年论坛》失败了，我是把它当成事业搞的。这明明是想办件好事，不明白他们（指党团组织）为什么还不让办？”林说：“过去你和他们关系太好了，你怎么和他们接近，他们也不相信你。今后你应该和他们把关系搞坏。”谈到青年论坛，林说：“我根本就不主张搞这种事！”我还说：“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群众和朋友，今后我要在政治上隐蔽起来。”从此，我曾埋头钻研业务。

（2）11月后，由于我和林接触增多，林曾对我说：“你尽量不要公开找我，如果要找，在晚上十点以后，并且在外面谈。”由此可见，林和我的密切关系。

（3）1962年底，一次与林散步，林高谈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我早就猜疑到他是具有政治野心的人，讽刺地说：“看来你是想当总理，你要是当上，可不要忘了我，起码给我个文化部长当当。”这虽是讽刺，但也说明我和他的关系。我觉察出他的政治野心，可未向组织进行汇报，直到1963年4月才做了第一次汇报。

(4) 1963年初，放寒假时，林有意搬到我宿舍住。两人出于反动立场，谈论中国政治形势。当时正是蒋匪叫嚣反攻大陆的时候。我认为蒋匪守着孤岛，没什么力量。林说不然。他拿了张纸，画了个草图，说：北部有苏、蒙，西南有印度，东南有蒋介石，东部有日本，中国四面受敌，国内矛盾尖锐，已是一堆干柴，一点就着。我也认为中国内外矛盾交困，很快就一定会变！（即实现修正主义的统治。）这些言论已经是反革命言论了。

(5) 我由于反动立场的急剧发展，曾经产生在中国生活不如在苏联好的叛国投敌思想，希望到苏联去。甚至我想只要能离开中国就行，就有办法去苏联。我曾和林表达过这种思想，林未表态。我也曾编造自己有法去香港，对林说：“你愿意去香港吗？我父亲有个朋友，有办法去香港。我不愿意去，我要想去早就去了。”目的是进一步对林进行试探，林亦未表态。

但是我并未参加林的反革命组织，当时也不了解他的反革命计划和活动。

和陈××的关系：

(1) 除了互相散布反动言论外，更多地谈论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化、文学艺术、哲学等，并带着欣赏的态度。

(2) 关于《青年论坛》，陈听说和团支部合办即退出。后来，他曾对我说：“老徐呀，其实你的《青年论坛》不是不能办，只是你旧名词喊得太响了，要多用些新名词。”（这是叫我打着红旗反红旗）

(3) 1963年9月，他被勒令退学，我曾和他谈话，劝他回家后要保重自己。他也对我说，要我“尽全力争取毕业”，不要闹个政治不及格，毕不了业。他离校的前一天晚上，请他到海淀喝酒，约定别后不联系，不来往。

(4) 他离校后，1963年10月份，他所属的团支部给他留团察看处分。我给他写一信，说：“函数班支部对你进行缺席审判，判处留团察看。”他没给我回信。

简单的分析认识（提纲）

(1) 已堕落到反革命边缘。堕落到背叛祖国和人民的叛国分子的边缘。

(2)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反动思想的互相影响。）

以上是我在上大学期间所犯的主要罪行。由于这些罪行，在毕业时曾受到全校毕业生（两个系）的批判和开除团籍的处分。当然，陆平黑帮对我的批判是极不彻底的，他们对我是有包庇的。今天我要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重新接受审查，接受批

判，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四、到五中后的情况

到五中后，我对于过去的严重罪行，虽有极肤浅的理论上的认识，但世界观的改造很差，很多反动思想又有所表露。这充分说明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不彻底转变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问题不能得到彻底地解决。下面交代到五中后的反动思想和言行。

（一）文化革命以前（1965年8月—1966年6月）

1. 对思想改造的放松，有离开北大无事一身轻的想法。我没有勇气把自己反动历史全部交给群众，让群众监督改造自己。而是把问题包起来，只与少数几个人谈过自己的问题，谈得也不全面彻底。

2. 不安心中学教育工作的思想，特别是在1966年3、4月间闹嗓子时，曾给父亲写一信，说嗓子坏了也许是个好事，会因此调个好工作。另外，也曾和校外专家、教授联系，想找些门路。

3. 关于突出政治：1966年初报上登出介绍南京部队政治工作经验，批判了“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去”的反动谬论。我心中一闪念，认为这是否有些过“左”，并和组内老师说：“看来对这些问题要重新认识啊！”

4. 欣赏反动的旧文化，曾和某老师说：“我认为读书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我们应享受人类所创造出的一切文明财富。”

5. 吹捧卡斯特罗：在中古关系破裂时，我说：“古巴也修了，过去我还很崇拜卡斯特罗呢！”并且吹捧过两个哈瓦那宣言，胡说什么“它不仅在反帝的政治内容方面，就是在使用语言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

1. 由于运动初期受过冲击，整个文化革命运动中消极，未参加群众组织，有半年左右处于消极状态。

2. 1967年7月30日以后，有一段思想同情矿派，后来看到矿派反军本质，才逐步有所转变。

3. 在批资反路线时，对自己过去的罪行有翻案思想。曾对几个老师讲，我过去的错误只是搞了个《青年论坛》，甚至美化它是反陆平的，好像自己是个造反派。并且说：“如果不提我过去的问题便罢，若提，我就把它彻底翻过来。”这是极疯狂的翻

案言论。

五、对问题的认识

首先，我的问题必须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纲上来认识。在1962—63年，国内存在着十分激烈复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着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他们网罗牛鬼蛇神，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各个方面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在国际上，帝修反趁着我国暂时困难的机会，大搞反华反共的罪恶勾当。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挑起了公开的论战，各方面猖狂反华，国际共运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也公开地、彻底地表现出来。在这个国际国内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正是我犯罪的时候。我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完全站在了资产阶级方面，站在了苏修和刘少奇方面，站在了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方面，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攻击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仅是攻击，而且在同学中间广泛散布，造成极恶劣的影响。还大肆进行反动活动，直接地、积极地参与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从这些方面看，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极端严重的罪行。

单拿我所进行的反动宣传来说，在我班同学中间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这不仅由于我散布的言论的广泛，而且还由于我使用的手法带有很大的欺骗性，易于蒙蔽群众。我常常打着漂亮的招牌进行反动宣传，比如标榜自己追求信仰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招牌下为苏修当吹鼓手；标榜自己是集体主义者，在集体主义背后宣传最极端的个人主义；有时还打着思想改造的招牌，借互相谈心、帮助自己解决思想问题的名义进行反动思想的宣传。这样做的结果，使不少同学受了我的蒙蔽，他们参加了我搞的一系列反动活动。尤其是对陈××、张××、温××、杨××等。

我虽然这样标榜自己，是不是我就只是认识问题，是好心办坏事，追求真理而走上了歧途呢？不是！我的问题主要是立场问题，是站在顽固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向社会主义、向党、向毛泽东思想进攻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就拿支持苏修来说，如果我能站在革命人民的立场客观地看问题的话，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是很容易认清的。国际上，苏修同美帝勾结，扼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办尽了坏事。如果我站在受苏修毒害而遭受严重损失的伊拉克共产党人的立场，对于苏修的三和两全不是会深恶痛绝吗？如果我站在我国广大革命人民的立场，对于苏修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罪行不

是会激起应有的民族义愤吗？如果我站在苏联国内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对苏修复辟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同时对人民进行法西斯专政统治的苏修叛徒集团不是会激起阶级仇恨吗？但是我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而是站在苏修特权阶层的立场，自己追求做一个像苏修国内上层知识分子那样的精神贵族，立场当然会站在苏修方面。我对于苏修的宣传都是不假思索地相信，正表明了立场。由于立场错了，就不敢正视现实，不敢正视真理，也就不可能认识真理。

当然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反对党领导科学教育事业的问题，反对党的政治运动的问题，都很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反动立场。

今天，我认识到我的所作所为，我的思想言论是完全错了。这里首先有个转变立场的问题，有个把立脚点移过来的问题。其实认识问题也是立场问题，立场变了，立脚点移过来了，才能认识自己过去的错，也才能正视客观事实，看到党的伟大，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认识自己言行错在哪里。

六、犯罪的根源

我生长在新社会，为什么犯这么严重的罪行呢？这是应该认真地总结的。毛主席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对于我来讲，应认真总结犯罪的沉痛的经验教训，深挖犯罪的根源，长期进行自我改造，这才能保证今后不再犯罪。

我犯罪的根源，从世界观上来说，仍然是个“私”字，对我来说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另外，也有阶级根源和社会上的坏影响，以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长期的毒害。我的个人主义也是有阶级根源的，这些东西是相互交织的。当然，从主观上来说，长期拒绝思想改造，不认真读毛主席的书，也是极重要的原因。为了更深刻地挖掘自己的犯罪根源，有必要仔细地回忆一下我的思想发展过程，看看在这个过程中哪些是起了决定作用的，以便在找出根源的同时，吸取犯罪的痛苦的教训。

（一）个人主义思想的滋长和发展（1958年7月以前）

我从小形成了极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这首先是与家庭的影响分不开的，是有它极深刻的阶级根源的。

我父亲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有浓厚的向上爬的思想，经常向我散布“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反动思想。比如在我上小学时，叫我学理工，当工程师。并且从小鼓励我在学校成绩上争第一。母亲在我上小学

时就不让我和邻居小孩玩，说他们是“野孩子”（劳动人民出身的孩子），把我关在小屋里，终日读书。我从小就在这样的教育和环境里长大，只知道读书，其余什么事也不过问，抱着一种成名成家的所谓理想，埋头在书堆里。从学校教育来说也是这样。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当然是这样，解放以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很深，对我这样的学生是很重视的。我多次得到老师夸奖，学校表扬，亲友也常常鼓励。慢慢地，使我的思想上形成了极不健康的東西，这在我反动思想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高人一等的思想和自信心，轻视体力劳动和劳动人民。这可以说是剥削阶级从小给我遗留下的烙印，是深深地浸透在血液里的一种精神贵族式的优越感。

上初中以后，除了家庭和学校的毒害之外，书籍的毒害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埋头于书籍之中，对它们发生了兴趣，中的毒是很深的。当时我受了纯科学观点的影响，觉得人生应该追求真理，在真理的长河中能前进一步就是最大的快乐和幸福。我羡慕启蒙时代的自然科学家的生活，想终日生活在水文台中，白天研究数学，晚上观测天象。这时对父亲叫我当工程师的话听不进去了，我觉得那还不是最伟大的理想，要在自然界的真理的长河中游泳。同时这时我有计划地把自己培养成那样的人。从初二起，我开始制定生活计划，歪曲理解毛主席的三好号召，按照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路子培养自己，安排自己的工作学习，把自己培养成所谓“通才”。我的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在当时不但未受到阻碍和批判，反而受到鼓励。家里当然不会阻碍我，学校和旧北京团市委还用各种形式鼓励我，并把我拉入团内。

上高中后，学校对我这样的个人主义十分严重但是用功、听话、守纪律的学生，不但不加批判，反而十分重视，培养我当干部，鼓励我学习，使我的个人主义思想更急剧发展起来。但是由于自己的个人主义还未和社会发生矛盾，所以我对党没什么不满，表现上还是个相当进步的人。但1958年以后，社会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感到和我的个人主义要求有了矛盾，自己的不满情绪就开始产生了。

插一句，反右时，出于我当时的思想，对大学生中的某些右派是有同情的。其一是个人奋斗思想的共鸣，其二是认为他们有才能。但由于当时我处的地位，并未公开发表反动言论。

（二）对党不满的产生和发展（1958年7月—1959年9月）

社会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教育方针。1957年开始提出红专问题就和我格格不入。附带说一句，当时我在四中团委会里负责抓学习工作，但我不宣传又

红又专，反而把学习工作的重点放在搞学生课外小组上，搞了近一千人的课外钻研小组，完全是白专道路！1958年夏天开始勤工俭学，58年4月展开双反运动，反对个人主义，这触动了我的灵魂。58年暑假又搞整团，这些在学校中的深刻变革使我有些不舒服。我知道自己思想和社会的变革很不适应，58年4月也进行过思想检查，但是我最终是逃避了思想斗争。58年7月借病休学，连整团都没参加。后来，1959年5月又退学，就离开了火热的群众斗争，继续发展自己的个人主义和一些反动思想。

大跃进年代里，我躲在家里养病，每天到公园里打太极拳，到图书馆看书，继续做着个人主义成名成家的迷梦。在广大人民群众大炼钢铁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时候，我却躺在床上，拿着抽象的数学书，幻想揭露质数之谜。在广大劳动人民废寝忘食连夜奋战时，我却感到太紧张，感到太不自由，竟一头扎在18世纪法国的哲学、政治学书籍中，在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口号里寻找安慰，为自己个人奋斗的野心辩护，找理论根据。当时过着医院、公园、图书馆的生活，完全脱离了现实斗争。1959年5月我又忽然想考大学，到四中退了学。做了一点准备，于是上了北大数力系。我为什么考北大，也可看出我的反动思想。我当时在科大应用数学系和北大数学系中选择，父亲让我选前者，但我觉得应用数学是联系实际的，理论性不强，不愿意考。

（三）猖狂向党进攻和消沉的时期

由于个人主义和反动思想的发展，立场十分反动，在反右倾时，我十分同情彭德怀的言论。于是在向党交心时猖狂向党进攻，这是我反动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1959年向党交心是一次大暴露，矛盾尖锐化了，公开化了。这时，我受到了批判。如果我从这时起认真地进行思想改造，踏踏实实改造世界观，还不晚。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只是把不满藏在心里，不说了。实际上对党的不满则发展得更加严重。表面上看是消沉，实际是反动思想继续发展。

这时学校里也发生着一系列重大变革，如反右倾运动，教改运动，编红书运动，技术革新运动以及几次较长时间的生产劳动，我的态度都是消极的。但实际上由于我的反动思想，对这些运动都有不满。这为将来犯更大的罪埋下了种子。这时我又一次失去了改过自新的机会。

（四）平反和再次猖狂向党进攻

1961年，陆平黑帮扼杀了1958—59年教育革命的成果，对于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大好形势加以否定，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

尖锐斗争。就在这时，陆平等借甄别工作机会为我平了反，学校里风气骤然转变。不准提“白专”了，钻书本的风气大盛。政治活动减少到几乎没有，强调“小自由”多了，甚至超过了“大集体”。这种环境对我来说是太适合了，和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非常合拍。我当时感到五、六年来从未感到的自由舒畅的感觉。由于我未得到改造的阶级本能，就又蠢蠢欲动了。

首先，个人主义的所谓“理想”恢复了，我订了个人生活计划，得到了党支部的表扬。另外，自己的不满言论敢说了，可以说当时是做了极其充分的表演。自己在所谓搞好群众关系中，散布反动言论，猖狂向党进攻。还搞了不少反动活动，学习小组，《青年论坛》等，使自己反动思想又一次恶性发展起来。

这时，我的反动活动搞得连陆平等都感到有些过分了，于是他给我敲起了警钟，1962年11月对我提出了批评。这使我自觉的反党思想日益严重。恰在这时，苏修的影响和反革命分子林、彭的影响使我的反动思想，尤其是修正主义思想系统化，发展到政治上彻底反动。

由这个过程，应吸取什么教训：

(1) 不断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学习毛主席著作，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为什么人服务，为什么而生活这个最根本问题上狠下功夫。学习毛主席著作时要活学活用。

(2) 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走。自己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过去，“抽象地追求真理”，“寻找正确的人生之路”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3) 保持清醒的阶级斗争观念，注意抵制资产阶级毒素的侵蚀。过去我标榜自己思想是“开放式的”，什么东西都吸收，“每天都要吸收新的思想”，结果中毒极深。特别是对于苏修和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理论，必须要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

(4) 对家庭影响要彻底批判，肃清家庭的影响。

(5) 要不断革命，自觉革命，如果能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则为人民服务一辈子，改造一辈子思想。

接受犯罪后的沉痛教训。离开北大后，思想不能说没有转变，没有提高，但世界观问题没有解决。条件、土壤适合又要犯罪。到五中后，文化革命后的问题就是明证。

1969年5月1日晚

【资料】

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提纲）**一、对三面红旗的认识**

三面红旗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宝，1958年以来取得了辉煌成就。

我攻击三面红旗即反对毛泽东思想。攻击总路线，主要攻击政治挂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

认识到自己立场的危害性，配合右倾分子和帝修反反华，帮助了敌人。

我反对三面红旗与追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路分不开。害怕紧张，站在群众运动之外。

二、对苏修叛徒集团的认识

赫鲁晓夫篡权以后苏联的情况。

我支持苏修的背叛祖国，背叛人民。

认识苏修面目有一个过程，从古巴事件到最近的事件。但也有反复。在赫鲁晓夫统治时，认识苏联有民主。

社会主义阶级斗争问题是立场问题。只要正视现实是不难解决的。我班的情况说明了和平演变。

要认识自己支持苏修的罪恶：（1）是攻击毛主席，背叛中国人民。（2）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支持敌人。

三、对其他反党言论的认识

这些言论的实质，直接反对党的领导，反无产阶级专政，反社会主义制度，和右派一样。

关于党的领导：从党的历史看它的正确性。重弹右派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老调，被原子弹成功和其他成就所驳倒。

民主自由问题，主要是立场问题。为谁争民主自由？我为资产阶级包括右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争民主自由。

文化遗产问题：毛主席一贯正确对待文化遗产。我维护的文化遗产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旧文化，这些必须彻底批判，必须“焚书坑儒”，焚资产阶级书籍，坑资产阶级反动文人。

要找出自己攻击党的根源，原因是自己追求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四、对反动活动的认识

1. “争取群众”：

实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

这说明了我的“三无政治”的虚伪性。我无孔不入地进行资产阶级反动政治思想工作。

2. 学习小组：

业务上搞白专，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的一部分。政治上散布攻击教育革命、教改的言论，造成损失。

3. 青年论坛：

(1) 阶级社会，任何刊物都有阶级性，青年论坛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2) 散布反动思想，目的和效果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造成舆论。

(3) 当时的时代背景，邓拓反党杂文，各文化领域中的复辟逆流。

4. 和林彭陈关系：

说明自己走上反革命道路，堕落到反革命泥坑中。

我走上反革命道路与林的影响分不开。记取这个教训。

五、犯罪根源

(一) 阶级根源：

父亲的成名成家思想的教育。

家庭经济变化使我自觉不自觉地留恋旧社会，对新社会埋下了不满的种子。

(二) 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拒绝思想改造：

犯罪主观原因，世界观上是个“私”字，具体到我是极端个人主义。

从小形成个人主义思想，初中发展到自觉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发展自己。

1958年的变化触动了我个人主义的王国。但没有改造，逃避整团，钻进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政治书籍中。

1959年猖狂向党进攻，受批判后没有改造自己。1962年反动思想大暴露。

1962年受团内批评后又不改造，向反革命靠拢。

这个过程说明犯罪与主观上拒绝改造是分不开的。

(三)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的毒害:

生活在毛泽东时代, 不联系实际地读毛主席著作, 反而受资修的影响。

1958年读资产阶级反动书籍, 受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超阶级”观点影响, 自由平等博爱, 对社会不满。

1962年读《苏共纲领》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等, 受到修正主义系统影响。

1962年还受右派分子影响。

资产阶级文艺作品也是一个原因。

(四)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

上中学时鼓励我的个人主义思想。

上大学时, 陆平给我平反, 又一次鼓励我的个人主义思想。

(五) 吸取的教训(五点, 同检查草稿)。

(作者注: 本提纲未标注写作时间, 从内容分析应在1969年5月1日到5月10日之间。)

【资料】

首先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最高指示

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 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 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 是不可能的。

补充交代几个问题(一)

一、关于我写的反动日记及文章

日记: 1958年记过很短的一段(顶多一个月), 1960年元旦起到1963年初每天都记。1963年8月—64年10月(中间有间断), 1965年4月—5月, 1965年12月—66年7月(中间有间断), 1967年底—67年初, 都断断续续地记过日记。

我认为1962年—63年的日记有很多是反动的。1963年8月以后的日记, 虽主观

上认为是思想改造日记，但仍有不少问题。

在1962年—63年的日记中，记载了我当时的一系列反动思想和反动活动，比如学习小组、《青年论坛》等。具体内容能记起的有：

1. 1962年8月一次日记中污蔑革命同学没有头脑，不理解共产主义的起码常识。他们受到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不敢大胆地思想，不敢大胆地生活”。“要提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提倡理性，反对盲从”。“要办一个刊物，以它为主体，点燃起新运动之火，使其燃遍全国。”

2. 在筹办《青年论坛》时，我还在日记上写过：“要在自由的旗帜上书上血红的大字——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不把自由的口号提得鲜明些，就不会获得足够数量的群众。”

3. 一次日记上谈到我和陈××的“友谊”时说：“政治观点不同的人也能交朋友，观点不同，个人感情还会是很好的。”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从整个日记的内容上说，大致有以下几个内容：

(1) 随时记录自己的读书计划，总结，以及搞学习小组，《青年论坛》的具体活动、打算等。

(2) 发抒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所谓“理想、抱负”及不健康的思想感情。

(3) 发抒自己的反动思想，尤其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等。

(4) 记载我和同学的关系，和同学的谈话及对同学的评论等。

1963年8月以后的日记，自己认为是思想改造日记，但也有问题。其一，反映出自己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其二，反映出对自己罪行不认识，甚至继续标榜自己“一直是追求真理的”，“只要认识了真理，就会坚定地向前进”，等等。我还记得的是，1963年9月7日的日记，那是在我22岁生日的时候，虽然表面承认自己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但仍然标榜自己“追求真理”，“知错就改”，标榜自己22年来的最大收获是所谓“行路精神”，意思是要积极地对待生活，不管走在什么路上，“路还是要走”，“要奋斗不已”。实质是坚持反动立场的一篇自我表白。我在1963年以前的日记都交给了北大党组织，交的时候还撕掉了几页，重编页码，欺骗党组织。

我撕去的几页，根据回忆，内容是：

1. 1963年初，林××建议我停止记日记，他说记这些东西一点也没有好处，老虎是要吃人的，不要把自己送给它吃（不一定是原话）。于是我在最后一天的日记中写：

“日记从今天起暂停，因为老虎要吃人了”，这篇我撕掉了。

2. 我偷看过同学温××的日记，里面记载党组织和他的谈话，说对我要警惕。我当时很生气，也很害怕，把这个事情写在日记上，这篇我也撕掉了。

3. 关于我和当时的女朋友的一些事情，及我给她写的绝交信的底稿，撕掉了，后来考虑没有什么，又把撕掉的部分夹在日记里交了上去。

文章：1958年在家养病时，在读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政治书籍后写过笔记，自己叫“哲学思想录”（仿照狄德罗），约十条左右，均已散失。记起的有：（1）对于社会平等的看法，认为一切革命都是为了实现平等，真正的平等只有到共产主义建成后才能实现。自己否认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归结于争取平等。（2）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认为合理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只能是互相帮助，是博爱，不应有其他任何关系。

此外，写过几篇文章，主要是学习数学的心得。记起来的有两篇是和哲学和政治有些关系的。（1）学习《自然辩证法》以后写的《数的概念的发展》，（2）1959年暑期写的《苏联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该文在1959年十月革命节时作为壁报贴出。两篇均在万字左右，自己未发现有什么问题。

1963年初写过几篇反动文章，记起的有

（1）《这是为什么？》文中虚拟一个人物，实际上指的自己。描写这个人如何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想为人民做一番事业。但是他的理想得不到实现，他周围的人也都不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随即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说有些人人为制造阶级斗争，而他就成为这种政策的牺牲品。

（2）《为了将来印证》，是支持苏修的反动文章。罗列了一些苏修的反动观点，主要是人道主义口号，我是支持、赞同的。但到底对不对，需要历史来考验。“为了将来印证，我写下这些话”等等。

（3）《四·一二有感》，纪念我入团七周年。发抒自己所谓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抱负（实际是追求修正主义），但是自己走上弯路，感到迷惘、徘徊。

以上三篇文章写过后不久就烧掉了。并且已向党组织汇报。

1963年夏天及秋天，在筹办《青年论坛》时写过几篇文章，准备在《青年论坛》发表，记起的有：（1）《什么是真理？》主要宣扬所谓“要用积极的寻求真理、探索真理的精神对待生活”，“马列主义是真理，但我们要弄清它为什么是真理，要真正

理解它”等等。(2)《为什么而生活?》实质是宣扬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思想。我虽然说要为共产主义、为人民贡献终生,但强调说自己应选择自己的为人民服务的职业,要有很强的事业心。

1964年上半年,出于想学文学的动机,开始练习写小说、散文、诗歌,实际上当然算不得什么小说、散文、诗歌,只是写着玩的。当时尤其喜欢散文,经常写一些。用当时的话说,“把它当成自己生活的印记”。

写过的“小说”有:《一个阴霾的秋夜》,《我们姐儿俩》,《我和金大哥》,并企图写长篇《悬崖·徘徊·新生》,写了百页稿纸左右。大概还有一些,记不起来了。这些东西我没感到有什么问题。“诗歌”多是一些短诗,具体篇目都记不起来了。

“散文”也有几篇,记得起来的有《牛虻和蒙泰尼里》,表面上批评,实质上是歌颂牛虻对他的敌人的爱,这是有问题的。《我赞美荷花》,实质是标榜自己像荷花那样纯洁,出淤泥而不染,这也是有问题的。另外,在1964年春节还写过一篇以春为题借题发挥的文章,发了一通小资产阶级的感慨,表示今后要争取生活中的春天的真正到来。肯定还有一些,也都记不起来了。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些文章使用的语言都很隐晦,用了很多比喻、双关。当时自己是很追求这些的。

以上这些文章,有的丢掉了,有的烧掉了,有的交给专案组了。

二、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

1963年初,从报上看到苏修的文章,称中国是“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统治的国家”,我也说过这样的话。还讲过:“中国跟着斯大林跑,毛主席也搞个人迷信”,攻击中国没有民主生活。

在五中和某老师说:“我校教师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连10%也没有。”这既是攻击革命群众,也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作者注:本材料未标注写作时间,从内容分析应在1969年5月1日到5月10日之间。)

【资料】

首先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最高指示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

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补充交代几个问题（二）

一、关于和林××、彭××、陈××等人的关系

1. 1963年初，林搬到我的宿舍住。一天晚上，熄灯以后，我和他谈起班上同学的情况。谈到陈××，我问林对陈如何看法，林不表态。我问为什么？林说：“这叫单线原则。”当时我很奇怪，为什么使用这种只有搞反革命秘密活动才使用的语言呢？我甚至怀疑到林是否是有组织的反革命分子。但我当时没有采取正确的途径，汇报给组织解决这个问题，而是用一种愚蠢而幼稚的方法，想咋出他的组织来。我谎称自己也参加了什么反革命组织，对他很了解等等。林听到这些，似乎很激动，坐了起来，说：“你说的这些如果是真的，你敢发誓吗？”我当时有些害怕，就故意一笑，说：“我说的都是假的，快睡觉吧。”林也一笑了之。后来，我听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一位同志说，林当时准备把我当发展对象。这天晚上的事，确实是十分危险的。

2. 1962年底，一次和林在校园里散步，林说：“你想想，中国共产党十三年来干过一件好事没有？从解放起，土改，三五反，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一件好事也没有。”我当时虽然一惊，但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并且，后来我还和其他同学重复过林的这段话。（大概是和杨××）

3. 1963年初，我曾和陈××说：“校外有个组织，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并说我参加了这个组织。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不过，我说这话反映了自己的反动思想，它是我想组织支持苏修的反动组织的最初的动机。当时我和陈说这话时，陈没说什么。后来在我与他快分别时，我又一次提到这事，说过去说的都是假的，根本就没有这个组织。陈笑了笑说：“我早就知道这是假的。”

二、关于《青年论坛》的一些问题

在1962年10月筹办《青年论坛》时，我写了非常反动的《发刊词》，其中把矛头指向所谓“束缚青年思想的传统观念”，指向所谓“邪恶势力”。这些实际上都是指党的领导，指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在我当时动笔写发刊词的时候，对于所谓“传统观念”，“邪恶势力”，头脑里

是有一个概念的，也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有所指的。拿“传统观念”来说，我当时反对听党的话，跟着党走，要求自由发展个性，这是我的一贯思想。凡是积极听党的话的同学，我都斥之为“没有头脑”，“没有理想”，“受到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另外，我当时想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认为有些同学口头上喊又红又专，实际上不读书，头脑空空，他们也是“受了传统观念的束缚”。还有一些同学，受了所谓“左倾之风”的影响，宁左勿右，批判别人无限上纲，自己“却不懂马列主义起码常识”（这是我当时攻击的话）。我认为这些人也是被“传统观念”束缚住了，不能解脱。由此可见，我所谓的“传统观念”是指党的领导，党对青年的教育和党的阶级斗争学说。至于“邪恶势力”，在我的心目中，指的是用“传统观念”束缚青年的势力，也就是指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具体到我生活的圈子里，指那些代表着党的领导的学校干部和学生干部。

由此可见我搞的《青年论坛》的反党性质。

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

通过回忆，发现过去交代的一条反动言论并不完整，重新交代如下：

1965年初，我在检查会上说：“毛泽东思想在民主革命阶段是正确的，这已为历史所证实。但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犯了错误，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又说：“要用他的正确方面反对他的错误方面。”

1969年5月10日

【资料】

作者说明：这是我在1969年“七一”被“解放”时唐山五中做的结论，现一字不动地抄录如下，内有不少污蔑不实之词，最可笑的是说我在“上中学时，曾妄图组织‘青年真理党’，想推翻共产党。”其实那时我是北京四中共青团的主要干部，实在不知此话由何说起。

徐明曜的综合材料

姓名：徐明曜，男，27岁。家庭出身：伪高级职员；本人成分：学生。原籍：北京市。现住河北唐山五中。

一、本人简历：略。

二、家庭主要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

父亲：徐光烈，56岁，现在北京天堂河农场五分场。解放前任天津伪中央银行高级职员，徐州宝来公司经理，伪中央银行行员。解放后留用中国人民银行。三反时因泄露国家机密被捕，判处机关管制二年。解除管制后因病辞职。徐对判决不服，一直对党不满。曾向徐明曜灌输“共产党政治上最毒辣，比国民党还坏”；“中国没有民主自由”等反动言论。

母：周碧波，家庭妇女。

兄、姐、弟、嫂、妻均略。

大姑、大姑父，二姑、二姑父，姨均略。

三、主要政治历史问题：

徐明曜1958年上中学时，曾妄图组织“青年真理党”，想推翻共产党。1959年考入北大，在60—63年期间，配合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散布了大量的反动言论，情节严重，本应严肃处理，但却被陆平黑帮包庇了下来，只给了开除团籍的处分，仍让其毕业并分配了工作。

（一）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二）反对党的领导。

（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向往资本主义制度。

（四）反对三面红旗，吹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五）攻击57年反右派斗争。

（六）吹捧修正主义。

（七）筹办反动刊物《青年论坛》：

徐明曜在1962年9月—11月积极筹办反动刊物《青年论坛》，徐企图“把这刊物由班级扩大到系，由系扩大到校，由校扩大到全国”，“用它点燃起新运动之火”。在反动的发刊词中，徐明曜说：“在今天我们还有必要提倡青年追求真理，提倡青年积极的思想，自己选定自己的道路，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该发刊词把党比作“邪恶”、“强权”，号召青年“打下邪恶势力的气焰”。尤其反动的是，徐将发刊词的日期选定为“双十节”（匪国民党的国庆），以此寄托盼蒋重来的妄想。

徐在策划过程中曾与反革命分子林××、彭××（均被捕在押）以及陈××（后

被开除)等多次研究。

四、徐明曜是陆平黑帮包庇下来的右派分子:

当时亲身处理徐明曜问题的人认为,徐明曜是被北大旧党委包庇下来的反动学生。

当时系级总支委员,徐明曜所在年级政治辅导员周言恭说:当时数力系总支对徐明曜的意见是:“开除团籍,不予毕业,带上反动学生帽子,劳动教育两年。”周言恭和当时数力系总支委员、办公室主任李志义共同将此情况汇报给彭珮云。彭珮云供称:一九六四年冬数力系周言恭等向我汇报徐明曜的问题时曾说:数学系党总支早在一九六三年就提出把徐明曜划为反动学生,要开除他的团籍。报到了旧党委和旧团委,旧党委不批准划为反动学生,旧团委借口要研究,一直没同意开除徐的团籍,包庇了徐明曜。

对徐明曜的处理意见

徐明曜,现年28岁,出身于伪高级职员,从小受其父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影响很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彻底的改造。徐在中学时企图组织“青年真理党”,妄图推翻共产党。在北大上学期间,尤其在62年至63年初,配合苏修反华,在学生中间散布大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三面红旗,妄图为右派翻案,吹捧苏修的言论,反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徐还在班内纠集思想反动的学生筹办反动刊物《青年论坛》,徐书写了发刊词,内容极端反动。后被学校制止,才未得逞。但其心怀不满,与反革命分子林××、彭××终日鬼混,互相影响,一起散布反党言论,情节严重。故徐大学毕业前夕曾受到全系师生批判,并受到开除团籍处分。

(曾受北大旧党委陆平包庇)

在文化大革命清队学习班中,徐能主动交待问题,对自己的问题认识较好。这阶段没发现新的问题。

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虽然徐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思想是反动的,但徐的态度较老实,给予从轻处理:定为严重政治错误,不予处分,并给予适当工作。(劳动锻炼改造思想一阶段)

唐山五中革委会

69. 6. 9.

唐山齿轮厂革委会对徐明曜问题的处理意见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重新审查未发现新问题。群众批判是正确的。该问题不做重新处理。

唐山齿轮厂革命委员会（章）

1969年6月22日

【资料】

首先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最高指示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对五中处理意见的一点说明

一点说明

在对我的问题的定案材料里，有一个情节需加以说明：

该材料说，我写《“青年论坛”发刊词》，选在“双十节”，是为了寄托盼蒋重来的反动心理。这是不符事实的。1965年4月北大毕业生对我进行批判时，也这样提过，我并没有承认。我认为，在10月10日写《发刊词》，全是偶然的。因为当时从主观上来检查，并没有盼蒋重来的思想。自己认为对蒋匪帮和美帝国主义基本上还是有所认识的。👍

徐明耀

1969年7月1日

【资料】

1979年申请平反

数学系总支：

我在1965年4月大学毕业时曾经受到全系毕业生为时一周的批判，并受开除团籍的处分。由于这次批判，1966年6月在唐山五中又受到大字报围攻，1968年8月—1969

年7月被隔离审查十一个多月，受到殴打、侮辱，使身体和精神都遭受到折磨，造成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至今未愈，1972—74年曾不得不在唐山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并休养过近半年。

根据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我认为过去对我的批判和处理有很多不妥之处，希望党组织重新审查，予以平反。为此，特申诉以下几点：

在我的大量“反动言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今天看来是正确的，是对当时的一些事物如实的评价。即使有错误的东西，也是一时的认识问题。

在我的“反动思想和言论”中绝大部分是出于改造思想的目的主动和党组织谈出的，结果都成了我的罪证，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

在批判中以及我个人被迫写的检查中，由于无限上纲，有很多把无意说成有意，把一时糊涂的想法说成长期固定的看法，把客观效果说成主观动机的地方，甚至还有主观臆断，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的东西。由于不按上面的口径说就不能过关，我也写过一些不实事求是的检查，特别是对1963年底写的《对过去的清算》和1965年4月写的《大学五年半的总结》^①，我正式声明这两份检查是被迫写的，根本不实事求是的，应该作废。

我和林××、彭××反革命集团无丝毫组织上的联系，对其反动纲领、计划及其叛逃行动一无所知，因此应把我的问题和他们的问题区分开来。

“青年论坛”从当时筹办它的主观动机来看是好的，革命的，《青年论坛发刊词》正反映了这种动机，它绝不是反动的，因而不应把《青年论坛》称为反动刊物，并且我认为对于青年人这种自发的探讨真理的活动应给予支持和鼓励。

数学系研究生 徐明耀

1979年9月25日

【资料】

对“申诉书”的几点说明

我在1979年9月向数学系党总支写的申诉书中提到的五点申诉过于抽象，为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看法，特作以下几点说明。这些说明是根据回忆，就1965年4月全系毕

^① 即《我的大学（三）》中展示的《个人总结》。

业生对我进行批判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所作的申辩。由于事隔十四年半，我手头又没有文字材料作为依据，因此很可能出现记忆不准确或遗漏重要问题的情况，仅供组织上对我的问题进行复查时的参考。如有情况不清之处，希望组织上能提出来，以帮助我进行回忆。

一、关于“反对党的领导”的问题

“反对党的领导”是当时对我进行批判的主要问题。当时说我“从根本上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且公开号召同学反党”等等。我认为这些指责是不实事求是的。因为在当时对我批判的主要依据只有

1. 我曾经对当时的过左的做法有过怀疑，比如大炼钢铁运动，大跃进中的浮夸现象（放高产卫星），教育革命中的轻视理论，片面强调联系生产实践的倾向，对自然科学理论随意加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并加以批判的做法，在思想教育中片面强调听党的话而不启发青年独立思考，追求革命真理的错误倾向等。这些只能说是自己看到了当时党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而且又都是在向党交心中说出来的。把这些看法认为是反党是没有根据的。

2. 认为我“有个人野心”，“组织学习小组（1962年）是反党的组织准备，”这些也毫无根据。诚然，党培养我到北京大学学习数学，我是想把数学学好的，甚至也想在数学上作出些成绩。但是这种愿望和个人野心是根本不同的。为了学好数学，而且不止自己学好，和同学们一起都把数学学好，我才组织了学习小组。这分明是件好事，却被荒唐地指责为“为了将来篡夺党对科学事业领导权做的组织准备，”这是毫无根据的。

3. 认为我筹办《青年论坛》是反党的舆论准备，青年论坛发刊词是反党纲领，是公开号召同学起来反党，这更是缺乏根据。当时办青年论坛的出发点是是想提供一个同学们互相交流思想、讨论问题的园地，主要讨论青年人感兴趣的、政治、生活、学习、修养等方面的问题，而且筹办这个刊物也不是我个人的主张，而是群众自发的产物，这点看和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陈××、张××、杨××、温××、王×等人了解。当时特别提倡自由讨论、独立思考，是针对当时青年人中间存在的问题提出的。青年论坛发刊词对于这个刊物的宗旨写得也很清楚，总的前提还是要在党的思想原则指导之下的。但是在批判中（包括我自己的检查中），都不顾事实地说这个刊物是预谋的反动刊物，目的是反对党的领导。并说发刊词中所说的“反对邪恶势力”指的就是反党，

“追求真理”指的就是追求资产阶级反动腐朽的东西，可以说这只能是主观臆断！而我本人在党团组织多次谈话之后，在无数次无限上纲之后，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反动的刊物，这只是为了能过关。

4. 附带提一下关于“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记得主要根据大概是我在中苏论战时说过，斯大林搞个人迷信，中国跟着斯大林跑，因此是影射攻击毛主席搞个人迷信。另外，向组织交心时说过，阶级斗争强调得过分是不是会犯错误，后来大会检查时又上纲成“毛泽东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正确的，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否犯了错误，阶级斗争强调得过分了。”这些话只能反映当时自己对“领袖是绝对正确的，不会犯错误”这点有过一些怀疑，而在把领袖神化的社会风气下就成了“恶毒攻击”了。实际上，我对毛主席一直是非常钦佩的，初中时我就通读了毛选1—3卷（当时第4卷还未出），并且和同学们（包括林××在内）说过，“我认为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只有孙中山和毛主席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革命家，毛主席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但在批判时这些正确的话自然无法再提，只强调了在当时看来有问题的话。这样的批判是不能使人心服的。

二、关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向往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

在对我的批判中，所谓“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向往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容是很多的，我认为也不切合实际。因为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而且是十分赞成的。说我“反对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主要是根据下面几条：

1. 我认为当时民主生活不健全，应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感到在选举时，哪怕是选班长或小组长，也都是先由上级定下来，选举只是走走形式，我认为这种做法不能代表广大群众的意愿。今天看来，这实际上是当时我们的民主生活不健全的一些表现，并不能认为一提民主，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民主。

2. 对当时政治运动中的过激行为和扩大化问题有些看法，比如我认为“反右搞得面太大，有的大学里一个班大多数人都是右派”，“应重新估价反右斗争”，“反右中伤了一些有才能的好人。”认为反右倾搞得过火了，困难时期以后，可以看出右倾分子的观点是有正确的一面的（当时是否提了彭德怀的名字我也记不清了）。我还认为，由于“政治运动搞的过火”，造成群众不敢讲真话，怕一讲出来就挨批判等等。这些看法在当时被指责为“为反动阶级鸣不平”，“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反

对无产阶级专政”，我觉得这是不妥当的。因为不管这些看法是对是错，发表这种看法（而且大部是向党交心时谈的）还只是一种认识问题，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有目的的，有行动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3. “向往资本主义制度”主要是指在中苏论战时出现的一些认识问题，尤其是指我当时对于苏共二十二大中通过的苏共新纲领的一些错误认识。我当时看到了苏共纲领中关于发展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条款，感到提得很正确。另外，也受到它所提出的一些虚伪口号“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的蒙蔽，在1962年底到1963年初产生了对苏修的好感，这个问题后来很快就解决了（可见当时的思想汇报及检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属于一时的认识模糊问题，是出于不了解苏修的实质，特别是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而出现的，并且我所“向往”的像“发展文化科学事业”，“革命目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仍然是正确的，只不过苏修并没有照纲领那样做，这不能看成是“向往资本主义”。

三、关于和林××反革命集团的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组织上早已审查清楚，这里我只声明几点：

1. 我与林××集团毫无组织联系，对于他们的纲领、计划及叛逃行动均一无所知。

2. 我与林接触开始于向他学习英语，和他接触的时间是在1962年9月以后至1963年三、四月间。当时我正搞“青年论坛”，但林在“青年论坛”活动中并未曾起到什么作用。1962年11月青年论坛流产以后，确曾在林面前发泄不满，也受到林的一些思想影响。但当我感到林可能是反革命分子以后，立即和林断绝来往，1963年4月曾向李志义同志做了汇报。林对此有所觉察，还曾讽刺地说我“想得一块大奖牌”等等。

3. 文革清队中曾有人提出我“资助林叛逃”的问题，据说我曾给林20元，此事绝对没有。如果我曾借钱给他是有可能的，但我已记不清了。不过即使确曾借钱给他，也谈不到资助叛逃。因为我并不知林要叛逃，怎能谈得到资助呢？

四、所谓妄图组织“青年真理党”，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在1959年被批判后挖根源时讲出来的。实际情况是：我在1958—59年养病期间，曾有一天坐在月坛公园看《马克思传》，看到马克思年轻时参加“青年黑格尔派”，后来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时候，我当时想我们在今天应该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可以组织一个“少年毛泽东学会”，将来也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党，譬如叫“青年真理党”。这一切想法只是当时的一闪念，过后也就忘了。我既没有策划

如何具体组织这些组织，也没有和第二者谈过此事，只是在挖根源时以批判的态度谈到了这点，就成了“妄图组织青年真理党，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这是不切实际的。

五、所谓“争取群众”的问题

在同学的批判和我个人的检查中，曾多次谈到我和同学们的接触，并把它描写成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同学们散布反动思想”，“自觉地代表资产阶级和党争夺青年一代”等等，这实际上是不真实的，是在多次批判、检查和无限上纲之后形成的一个虚幻的说法。实际情形是，当时我和同学接触较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和同学谈心，谈思想改造。这是当时组织上号召的，可是后来就把我在谈心中说的一些话当成的放毒，而且说成是有意的。（2）和同学们谈学习、学习方法等，后来被说成是有意向同学灌输白专思想。（3）组织学习小组和筹办青年论坛期间和当时这些活动的骨干陈××、张××、杨××等常在一起谈话，在谈到吸收哪些人参加时自然要谈些同学的情况，这在后来被说成是对同学分类排队，有计划地和党“争夺群众”。以后组织上让我交代和同学们谈话的内容和动机，并让我写了多次检查，在这些检查中，逐渐地就把和同学们的正常接触歪曲成了有目的地为资产阶级“争取群众”的活动。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组织上可和当时与我接触较多的同学了解调查。

【资料】

对徐明跃一九六五年 受开除团籍处分的改正决定

徐明跃，男，数力系59级学生，共青团员。

徐于一九六五年在进行毕业政治学习期间，被认为在大学学习期间“一贯思想反动，拒绝思想改造，坚持反动立场”，受到批判，并给予开除团籍处分。

根据中共中央【1979】85号文件精神进行了复查，认为原对徐明跃同志所作的结论与实际不符，是错误的。现决定撤销对其开除团籍的处分。

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大学委员会

一九八〇年六月一日（加盖公章）

（作者注：此件中把徐明曜的名字写成了“徐明跃”，可见平反工作之马虎粗疏。）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方惜辰